



# 記憶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7月15日第14期  
总第160期

## REMEMBRANCE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60期

### 目录

#### 【专稿】

袁梦倩 文革记忆的政治：见证历史的危机与生机

乔晞华 试论文革中的群体理性——兼谈“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

一、“一个文革说”的缺陷

二、“两个文革说”的缺陷

三、文革的定义：内乱、运动、游戏、博弈？

#### 【宇清谈画】

王宇清 那些年，我们是怎样画画的（二）——再见，画里童年

#### 【争鸣】

小鹰 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小鹰 关于“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佯谬与辨析

二、有关“心理”说与“路线”说的讨论

三、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

四、有关“档案解禁”及“维权”说的讨论

五、有关“官民矛盾”说的质疑

#### 【述往】

刘明 红色少年的快乐岁月——缅怀1950年代的北京育才学校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七）——内蒙保安沼农场

#### 【本刊声明】

【专稿】

## 文革记忆的政治：见证历史的危机与生机

袁梦倩

文革是一场亿万中国人民参与或置身其中的重大政治运动，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动荡不安的阶段，也是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革命。数亿人的命运卷入其中，被碾压、消磨或者完全重塑。然而，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了四十年，尽管其早就被官方否定，如何叙述与反思文革、如何建构文革的集体记忆却成为后毛时代一道敏感而意味深长的意识形态裂隙。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直到今天，都很难在公共空间中真正被充分自由、开放、透彻地讨论。

由于长期以来官方将文革形塑为一个公共话语的禁忌，文革议题在媒介、教育、学术研究等场域受到种种限制，老一辈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年轻人对此隔膜更深。记忆的代际传承断裂，进一步加剧了文革的社会遗忘。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刻转型，个人主义、犬儒主义和物质崇拜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政治的冷漠，历史正在蜕变为无深度、平面化的娱乐景观。抽离了历史记忆的人们，陷溺在消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夹缝里有意无意地漠视历史。总之，文革被当作灰尘、不和谐的音符或引发对历史与现实争论的“祸水”，被丢入记忆的废墟。

然而，这样一场亿万民众卷入的革命，还有太多的历史真相未被挖掘，太多的创伤未被修复，太多的非正义未被审视。政治文化检视记忆，记忆也检验政治文化。文革结束后的这四十年，中国社会剧烈变迁，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如何回忆、观照、反思这段历史，也同时真切折射出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现实。

### 一、文革记忆的变迁：见证历史的危机与生机

80年代以来，官方对民间社会记忆和反思文革，力图“更深刻、更具体、更形象地反映这段历史”的欲望与诉求，长期以“维护安定团结”为由予以压制或边缘化。1981年《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文革记忆设定了官方的尺度，这个决议虽然在当时有相当大的进步和思想解放意义，但它毕竟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话语方式来叙述和反思文革，也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该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毛泽东同志错误领导和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sup>1</sup> 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不仅将毛泽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区隔，还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所谓文革的错误性）同“毛泽东思想”（所谓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切割，把文革的责任仅仅推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由此从意识形态的脐带上割断了文革和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深刻关联，从而避免了反思文革引发的政治信仰与信任危机，维护了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延续性和政权的合法性。正如杨继绳先生所言，“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sup>2</sup> 可以说，官方的历史决议是对文革的一场政治审判，并非一场历史的审判。

80年代兴盛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诉说文革创伤、反思历史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新的意识形态征用，为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新政鸣锣开道，重建党的威信和社会凝聚力。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文革叙述急于要克服、超越近期历史的伤痛，试图从前方寻找希望，因而没有深入考察复杂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纳入了某种希望和拯救的叙事模式，忽略了更为广阔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也就是说，这种文革记忆希冀历史中的人们卸掉创伤包袱，继续满怀信心地生存下去；但在展望未来的急切中，却没有深入创伤体验和政治历史的根源，轻快主观地写下了康复无恙的诊断。<sup>3</sup>

然而，不少书写文革的文本，依然有可能越过官方文革话语的界限，呈现这一历史更为复杂、敏感并具有争议性的细节，并触及文革与当代中国历史的联系。于是，针对某些文革题材作品的文化禁令频频发出。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中，有关记忆与反思文革的作品往往很容易触礁。1986年11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对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过严格审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各报纸、

<sup>1</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2-33。

<sup>2</sup>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记忆》104期（2013年11月30日）：20。

<sup>3</sup> 参见：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52；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7-122。

刊物和电台不要刊登、广播，对已经出版的这类专著文章，不发评论和消息。”<sup>1</sup> 1988年12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sup>2</sup>，根据中央“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贯精神，以“出版此类书可能引起的反效应”为由，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类图书的出版发行，为文革的记忆与反思设置重重阻碍。由此，文革在公共媒介上的记忆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便受到了较为严格的控制，言说与讨论文革的公共空间严重萎缩，文革的历史与记忆成为一个“暧昧”的禁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90年代初，经过“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执政者深感意识形态危机之严重，急于寻找、建构新的政治象征符号，于是以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开始了文革后第一次大规模纪念毛泽东的活动，有组织地重建领袖叙事、革命意识形态，制造主流话语引导下的“毛泽东热”。戴锦华指出，“毛泽东热”的现象意味着政治权力和消费主义的置换与合流，不仅折射出人们对现实的失落和不满，对社会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需求，也体现了主流话语和革命经典叙事借用毛泽东形象进行的意识形态再生产。<sup>3</sup>

同时，随着“六四”成为政治禁忌，新一轮的意识形态管控加强，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涉及历史创伤和政权合法性的议题被刻意地遗忘。然而，在普遍淡忘文革的情形下，“阳光灿烂日子”式的文革怀旧和商业化的文革物品消费却因为更容易得到官方的默许，反而成为较为流行的文革记忆。在徐贲看来，这种商业化、娱乐化趋向的文革怀旧把文革当作消费对象，而不是反思对象。它最大危险在于有可能把文革记忆变成一种无实质社会问题、无社会正义意识的记忆，变成一种对历史苦难、人性堕落和道德是非无动于衷的轻松随想；市场的力量正在协助官方权力完成了对文革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sup>4</sup>

新世纪以来，文革记忆的形式和内容则更加复杂、多元。首先，从政治社会环境来看，改革遭遇了“转型陷阱”，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的进程，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以权力寻租的方式

<sup>1</sup> “中央宣传部关于慎重对待专门叙述‘文革’历史的专著和文章的通知”（1986年11月18日，宣电[1986]17号），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数据库），宋永毅主编（香港：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3）。

<sup>2</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年12月10日，中宣发文[1988]31号，[1988]新出联字第8号），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sup>3</sup>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88-95。

<sup>4</sup> 徐贲，“变化中的文革记忆”，《二十一世纪》48期（2006）：19-28。

谋取利益、扭曲改革，贫富差距、腐败问题严重。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由于改革造成的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社会群体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sup>1</sup>

在这一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改革年代积累的种种矛盾与纷争进一步激化了人们对历史重新理解与评价的冲突。一种观点认为，文革之黑暗远未揭出，80年代的官方否定和文学书写只揭破了一层表皮，还涂了许多“创可贴”，而大量的罪恶、创伤、苦难被噤声、被掩埋，无法得到自由的、充分的表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红卫兵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它是一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实验，虽败，但价值犹存。而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比如目前严重的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道德滑坡问题以及对现代生活的不适等等都可能导致人们以一种怀旧的情绪美化文革，将文革想象为一种抗争现实的资源。<sup>2</sup>

同时，新世纪以来亦是中国新媒体高速发展并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历史记忆的生产和传播发生在一个超国界的传媒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空间）中。集体记忆的电子化和全球化为普通人的历史书写开拓了更多渠道，也助推了民间文革记忆和反思实践的兴起。一系列民间的文革记忆文本开始通过网络论坛、电子杂志、个人博客、微博、微信等不断涌现的新媒体形式传播。同时，由于国内对文革言说空间的限制，以及普通人在出版场域中文化资本的相对弱势，民间的文革著作（包括回忆录、传记、自传、口述史等）往往选择境外的出版机构出版或在国内自费印刷（即“自印书”）。从现实的情境来看，由于普通人作为记忆行动者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相对不太敏感，较少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反而更能规避严肃记忆对其的遏制，有更灵活的空间。并且，普通民众往往利用相对通俗的形式书写历史，其文革记忆与反思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远远超越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具有将文革历史从官方和精英记忆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

一方面，民间历史见证的意义在于拒绝遗忘，文革亲历者将自己的回忆写入历史，为历史留下证词，与遗忘进行抗争。长期政治文化的压抑和内心潜藏的创伤，使得当事人普遍地被沉默钳制，不愿从记忆中自我解放，为记忆发声。个体主动地去记忆和反思文革，往往被视为是一种“找麻烦”。然而，当很多历史见证者（主要指红卫兵一代）已步入晚年，回忆与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文革这段特殊岁月，并对自己的历史无法被年轻人所理解越来越感到焦虑。

<sup>1</sup>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开放时代》3期（2012）：125-145；孙立平，“论‘新改革观’”，《经济观察报》，2005年12月19日。

<sup>2</sup> 雷颐，“文革记忆与现实选项”，《中国民营经济与科技》9期（2012）：8-10。

越是在价值观多元而混乱的时刻,人们越是希冀通过叙述自己的经验来寻找身份认同,为个人的生命与公共的历史赋予意义。抢救历史、捍卫记忆的渴望,修复创伤、寻求正义的诉求,随着岁月凋零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只有拒绝遗忘,才能从历史中获得教育与警示,促进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于是,很多文革亲历者感到自己的责任,愿意打破沉默,分享他们的文革经历,并经由见证和反思历史,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不义进行抗争。见证不只是叙述历史,也是一种对危机的介入,介入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力图带来某种改变。

另一方面,民间历史见证的意义在于打捞被压抑、被边缘化的文革记忆,那些处于黑暗和沉默之中的声音,为民间文革记忆与反思实践开拓另类的空间,建构民间记忆和反思文革的社群,抗拒遗忘并争取普通人对文革历史的话语权。当下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民间文革记忆与反思实践是基于两个重要的民间文革电子刊物《记忆》和《昨天》。2008年9月13日,吴迪先生创建网刊《记忆》,在其发刊词中宣告,针对“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的成果在海外”的现状,此刊之出版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微薄努力”,把“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信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革研究”为办刊宗旨。<sup>1</sup> 2012年1月31日,何蜀先生又创办文革研究网刊《昨天》,以“抢救文革回忆、积累文革资料、交流相关信息、促进文革研究”为宗旨,指出“在一些文革亲历者纷纷如秋叶般凋谢,而有关档案又迟迟不能开放的现实情况下,抢救回忆和积累资料成为文革研究者亟需抓紧的前期工作、基础工作。在文革历史研究中,对史料的抢救、搜集、整理与积累,应该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应该有更多的有志者来参与。本刊愿为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交流园地”。<sup>2</sup> 这两本网刊在民间感兴趣文革历史、关怀文革记忆的群体(包括海内外文革研究学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为民间文革记忆与反思实践构筑了另类的空间,凝聚并培育了文革记忆和反思的社群。

已有的记忆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到权力的掌控,主流话语对人们记忆什么、遗忘什么有着严格的控制。多年来,在官方文革叙述“宜粗不宜细”的导向下,在普遍的社会遗忘中,文革记忆往往被再现为“野心家——造反派得势,老干部——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悲剧,或是娱乐消遣和商业化的荒诞闹剧。一些记忆被突出和强化,被塑造成为文革的主流记忆,而更多的记忆则被压抑和边缘化。可以说,记忆是意

<sup>1</sup> 参见:吴迪,“发刊词”,《记忆》1期(2008年9月13日)。

<sup>2</sup> 参见:何蜀,“发刊词”,《昨天》1期(2012年1月31日)。

识形态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他们的动力”<sup>1</sup>。而根据福柯对“知识/权力”关系的论述，民间的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属于一种“被征服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这种知识被视为是“被取消资格的，不足以完成任务或不充分表述的幼稚知识（naive knowledge），处于专制结构的底层，在必要的认识力和科学性之下”。<sup>2</sup> 也就是说，政治和文化精英们作为记忆与遗忘的主人，占有优势地位生产他们的历史叙述，但一些地位较低的、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则成为“没有历史的人民”。

被权力和资本边缘化的草根阶层对文革历史的回忆与解释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尤其是普通草根在文革中所遭遇的创伤和不义，往往没有资格被言说，亦缺乏与之分享的听众。如果说，文革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中一段被遗忘或边缘化的历史，那么，普通人的文革历史则更处于遗忘中的遗忘、边缘中的边缘。那些在主流历史里不曾被听见，亦“不够资格”被审视的普通人的文革记忆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的文革记忆与反思作为挑战主流话语的另类实践，有着直接的政治意涵，它构成了抗拒官方历史权威的基础。通过挑战政治和文化精英建构历史的霸权，不同的个体、群体分别推动其关于文革的竞争性的观点，从而呈现出历史更加生动、复杂、多元的样貌，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中心主义的话语。民间行动者将普通人被遗忘的、被边缘化的文革经验与主流历史对话，再现了有别于官方历史的民间文革记忆图景，并不断发掘新的文革议题，生产出新的社会意义。

## 二、“无法逃避的精神遗产”：文革记忆的现在与未来

文革的集体记忆是当代中国人无法逃避的精神遗产，人们被历史缠绕着，又奋力挣脱。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如何处理过去，如何面对现在，如何想象未来；这种焦虑、迷茫、困惑、不安全感，深蛰在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然而，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始终绕不开文革。总是要把文革这一页匆匆翻过去的心态，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创伤依然在化脓，基因依然在变异，文革的历史阴影仍以各种方式缠绕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正如韩少功所言，“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

<sup>1</sup> Michel Foucault,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Radical Philosophy* 11 (1975): 25.

<sup>2</sup>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by Michel Foucault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82;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New York: Picador, 2003), 7.



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sup>1</sup>

创伤如何被修复，暴力的罪责如何被救赎，公民的权利如何被保障，历史的正义如何被捍卫，亟需求索。拒绝遗忘，而去直面和反思那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去打捞那些被遗忘的、被边缘化的记忆，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拷问，对千千万万逝去的生命的责任，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与民族精神文明的洗礼。只有真实地面对过去，只有将历史教训化为今天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理解记忆与反思文革的实践，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脉络中，尤其是从毛时代与后毛时代的关系之中，理解它们之间深刻的连续性与转型。一方面，文革并不是孤立的历史时期，它与文革前后革命的政治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今天，文革研究之所以在中国大陆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今政治文化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对文革政治文化批判性透视的空间，禁忌和避讳重重。

文革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许多不同层面的积极的改革，后毛时代的权力场域以一种多元的逻辑运作，并且不断地动态变化。但是，由于一党专政的总体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政治体制改革较经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尽管局部的体制性的变革力量已不断推动这一专政场域的转型，但其内在结构性的支配机制依然在发挥着深刻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文化痼疾并未根除，甚至以一种更加精致的形式再生产它的象征秩序、权力技术、话语方式与组织机制。即使是将专政场域的逻辑应用在市场经济改革上，也依然可以窥见其中人治的、运动的和暴力的逻辑在改革时代的影子。从“政治挂帅”到“经济挂帅”，国家“运动式治理”的思维和方法贯穿其中，这种专政的政治文化并没有结束，其感人的复杂性依然时时笼罩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即使专政的场域本身已经在发生深刻的转型，但由于客观结构的变迁过于迅猛，人们（尤其是红卫兵一代）在毛时代政治文化中所形塑的心智结构并没有真正转变，还可能无意识地维系着那些长期被主流文化所形塑的习惯，那些在文革政治文化中不自觉地追随的种种感知、思维、话语和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政治文化认同产生分歧、错置的时期；在新的认同形塑的过程中，文革的记忆常常是建构认同重要的象征资源。记忆从来不仅关

<sup>1</sup> 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开放时代》1期（2006）：145。

乎“过去”，也关乎“现在”和“未来”。“过去”不会以完全客观的面目呈现于“现在”，“现在”的语境、心理和利益关系以及对“未来”的想象都会影响对“过去”的重新描述与协商，同时“过去”也往往被用来支持或合理化“现在”的政治行动，甚至成为“未来”实践的指引。正如李陀指出的：“历史记忆常让人觉得虚幻缥缈，其实一点不虚，由于和现实有着实实在在的关系，它更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正在被争夺的殖民地。我们不但经常看到一种历史记忆会排斥、驱逐另一种历史记忆，不但有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真实的历史叙述，甚至还会有对历史记忆的直接控制和垄断，当然，也就有了反控制和反垄断。”<sup>1</sup>可以说，在改革共识破裂、价值观多元的今天，文革的记忆和反思已成为各路政治文化力量、历史观念、社会想象争夺的领地。

诚然，书写文革历史记忆的工作牵涉到许多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难题，任何社会的集体记忆都难免受到当下认同的重构。因此，一个社会要对其历史记忆获得共识并不容易，特别是处于社会遗忘加剧的“信息不对称”中，我们对文革的历史记忆或许难以形成共识。其一，文革的历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有不同的主体、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形态。从路线的分歧、官民的对立、派系的倾轧、阶级的博弈，到私人的矛盾、历史的恩怨、理念的冲突、利益的“站队”……种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盘根错节，都成为文革的底色与背景。其二，现实政治文化认同的差异背后，是每一个记忆和反思主体所处的社会脉络、社会位置、社会关系，及其所积淀的信息、思想资源的差异。如同“盲人摸象”，个体的生命经验的不同，所建构的价值体系也不同，其对历史的认知与情感也必然是多元的。

因此，笔者认为，记忆与反思文革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文革，而是在普遍的社会遗忘之中，抢救文革记忆，挖掘历史真相，拒绝遗忘，促进反思。在承认记忆多元性的前提下，建立多元对话的平台，多方相互沟通、交叉印证，以事实为依据，不做刻意的妖魔化或美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建构一个关于文革记忆和反思的“标准答案”，而是着力拓展记忆和反思文革的公共空间，推动公民的记忆权，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和条件将自身的历史经验呈现出来，让多元的记忆和反思话语“众声喧哗”，相互补充、争持、辨证、理解。

各种不同的历史阐释公开论述，互相质疑也互相丰富，不仅可以使每一种论述获得更深刻、更宽广的反省空间，也可能促进不同立场的互相理解，这是社会共识得以建构的基础。如果不反思过去，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紧张亦无化解的可能。面对多元的历史记忆，正

<sup>1</sup> 李陀，“序言”，载《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x。

如唐小兵所言，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让一切有争议和分歧的历史记忆都在公共空间生长出来，让一切自以为稳定和固化的历史理解都产生摇摆感，让一切约定俗成的历史感情和伦理都重新问题化，我们才能真正超越基于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或许通过这样一种艰难的过程，我们才能学会超越意识形态地独立思考，超越一己之偏见去聆听和理解各异的声音，才能学会包容异端和容忍多元。”<sup>1</sup> 如果没有公共对话的素养和耐心，没有不同信息、思想资源的交融与碰撞，人们往往倾向于沉浸在自己固有的认知与情感框架之中，而不易产生另类框架的内在觉察。正是由于缺乏沟通理性，很多关于文革的“公共对话”最终往往沦为“自说自话”。只有在与不同社群相互对话的过程中，不同信息、思想资源的互动中，新的认识、情感与行动才能形成。

总之，记忆和反思文革实践更为深刻的政治意义在于，公民经由记忆的能动性和历史反思意识的觉醒，积极争取公民的记忆权、历史话语权，开拓现实政治、文化参与的公共空间。人人都有作为历史主体的权利，都可以作为公共历史的叙述者、调节者、见证者，践行公民的历史权利与社会责任。诚如郭于华所言，“人要回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位置上，人是历史的主体，去追述我们的权利、实现我们的权利，同时承担我们的责任……揭示普通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sup>2</sup>

见证的危机亦同时孕育着生机，公民作为历史主体见证文革的欲求虽不断被压抑、搁浅、阻挠，但又如野草般不懈地从记忆荒原的边缘处反扑，萌芽、发展、生生不息。当前正在兴起的民间文革记忆与反思行动折射了社会内部不断涌现的渴求变革的动能；每一个个体的历史意识的觉醒，都蕴含着推动社会转型的能量。记忆和反思文革绝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也不可能是一呼百应的诉求，更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靠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一点一滴的行动，扎根在中国当下政治文化的土壤里，链接着过去与未来。■

本文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

<sup>1</sup> 唐小兵，“让历史记忆照亮未来”，《读书》2期（2014）：59。

<sup>2</sup> 郭于华，“社会记忆与历史权利”，《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16日，AA29版。

【专稿】

## 试论文革中的群体理性

### ——兼谈“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

乔晞华（美）

#### 一. “一个文革说”的缺陷

“一个文革说”的代表人物金春明是这样定义文革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领袖亲自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sup>1</sup>高皋和严家其对文革的定义是：“文革大革命”是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sup>[2]</sup>。

上述定义和描述中有一个共同之处：文革是一场运动。文化大革命尽管名为“革命”，但是如前所述文革并不是“革命”，更与“文化”无关。按照“一个文革说”的定义，文革是运动，并非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尽管文革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sup>[3]</sup>，但是坚持“一个文革说”的学者批驳“两个文革说”的论点是：“人民文革说”是否能够成立的关键在于“要看是否存在着所谓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sup>[4]</sup>。该派学者认为，在这方面“两个文革说”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群众组织身上找不到一丝的反抗所谓“暴政”的影子，更不用说有任何“反共”

<sup>1</sup> 金春明。1995。《“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前言部分。

<sup>[2]</sup> 高皋、严家其。198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页。

<sup>[3]</sup> 陈子明。2006年/2014年。“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今天》第74期，2006年（秋季号）。《昨天》第28期，2014年1月。

<sup>[4]</sup> 关于郑义提出的“人民文革”版本，我们在下一节里讨论。

的味道。该派学者定下的一条界限是：对某些单位领导人的不满同对共产党整体领导的不满，对现实社会的某些体制和现象的不满同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满是有根本性区别的。更重要的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目标既非改朝换代，也非推翻国家政权和打倒共产党<sup>[1]</sup>，即使有反官僚的因素也只是反官僚不反皇帝，连古代的造反者都不如<sup>[2]</sup>。总之，“两个文革说”的致命问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sup>[3]</sup>

“一个文革说”的学者在这里采取了一套双重标准。“人民文革说”的成立需要建筑在造反派是否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基础之上，虽然文革被他们定义为是“运动”并非“革命”。换言之，“人民文革”必须以推翻现行政权才能成立，而“毛文革”却不需要以推翻现行政权为目的却能成立。文革由中共号召全民参加，形式上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sup>[4]</sup>。由于没有把推翻共产党的政权作为目标，亿万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只能与文革出现的其他自上而下的党的运动被归在“一个文革”这个“百宝囊<sup>[5]</sup>”之中。按照“一个文革说”的“反皇帝”的标准，其实“一个文革说”也不能成立，应该是“零个文革说”更为合适。

根据社会运动的理论，社会运动分为4类。其中一个重要而又常见的类别是“改革运动”。改革运动参与者的矛头并不指向现行的制度，他们只是希望对现有体制进行局部的改革。运动的目标是改革社会的某些不合理部分，并非企图推翻整个现行体制。美国黑人人权运动就是一例。著名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争取与白人同等地位，通过非暴力的抗议行动，争取黑人人权的斗争并没有提出推翻美国的现行政权。（如果金博士不明智地提出推翻美国的现行政权，黑人人权运动恐怕早已夭折。）即使是主张采用暴力手段的美国黑豹党<sup>[6]</sup>也没有明目张胆地提出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主张。按照“一个文革说”

[1] 金春明。1998。“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 徐友渔。1999年。《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174、176页。

[3] 郑兵、雷颐、韩钢、李郁。2004。“漫谈文革研究”。《往事》第一期（2004年9月28日）。

[4] 席宣、金春明。2005。《“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页。

[5] 关向光。2006年。“文革再认识”。《展望与探索》2006年6月4:6期，第7-11页。

[6] 美国的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 Party)于1966年10月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成立。该党以武力的方式对抗美国政府，保卫少数民族社区不受美国警察的威胁。黑豹党提出过在黑人区里建立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把在美国全社会建立社会主义作为其奋斗目标。该党在黑人社区搞过免费早餐，试图获得民心。1967年4月25日，作为该党的新闻喉舌“黑豹”报正式首期发行。黑豹党曾向美国的在校大学生推销“毛泽东的小红书”用以筹款购买枪支，并将小红书定为必读书。在毛的时代，暴力革命一直受到推崇，黑豹党的政治主张与文革中中共的主张极为接近。黑豹党

学者的标准，中国的1976年的“四·五”运动、1989年的民主运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社会运动，因为它们只反对“四人帮”，只是请愿要求民主化，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共的政权和现行体制。

既然文革中根本没有“一个文革说”学者所指的那种“革命”（无论是“人民文革”还是“毛文革”），为什么他们对属于“改革运动”的文革造反运动与党的运动的迥然性质视而不见呢？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总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无论假设是明确的或是暗含的<sup>[1]</sup>。持“一个文革说”的学者认为群众造反运动不能独立作为社会运动的暗含假设是：亿万民众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乌合之众”，是一群没有思想只会盲目跟从，被毛忽悠的群氓。

例如，持“一个文革说”的席宣和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提出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因为亿万群众卷入文革的原因是：一出于对中共和毛的信赖；二中共长期以来左倾思想对干部和民众的广泛影响；三政治思想的强大压力，运动中民众被迫作出抉择；四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乘机蛊惑挑唆，蓄意制造动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sup>[2]</sup>。简言之，民众参与文革是盲从、不明真相。

徐贲认为毛对各种各样的群众始终牢牢地维持着全面控制。毛对群众的杂异性可以说是了然于胸。毛一直非常成功地利用和控制这种杂异性，将它转化成同一股供他随意调遣、派作不同用途的基层力量。在这一点上，毛展现了巨大的蛊惑天才。控制局面的始终是毛，而不是任何其他个人。尽管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但是这种逆反的作用有限<sup>[3]</sup>。有学者更明确地提出，民众效忠个人，不辨真伪，失去个性，只有感情狂暴，没有推理能力，变成了乌合之众<sup>[4]</sup>。

陈子明先生甚至借用曾担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朱成昭之口，提出文革是“三子”的游戏：毛作为导演是“骗子”，造反派作为演员是“疯子”，

---

曾拥有5000多成员，“黑豹”报发行量曾达到10万份。后来黑豹党由于内外原因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sup>[1]</sup> 明确的假设（Explicit assumption），暗含的假设（implicit assumption）。

<sup>[2]</sup> 席宣、金春明。1996/2005年。《“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367-368页，2005年版，第319-322页。

<sup>[3]</sup> 徐贲。2010年。“‘人民文革’和中国‘群众’”。《纵览中国》（2010年2月18日）。

<sup>[4]</sup> 王克明、宋小明。2014年。“前言”。《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

逍遥派作为观众是“傻子”<sup>[1]</sup>。还有学者认为毛有病态人格<sup>[2]</sup>。

对于毛在文革中是否全面控制一切是有争论的。有学者认为独裁者的政治影响力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即使大权在握，毛的政治抉择也并非完全随心所欲<sup>[3]</sup>。印红标认为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毛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式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sup>[4]</sup>。王绍光认为，毛虽然动员群众发动了文革，但是他很快转入“救火队”的角色<sup>[5]</sup>。班国瑞认为，毛采用群众运动的策略比较冒险，总是以群众运动失控而告终<sup>[6]</sup>。根据解密的1968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文革的评估，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认为毛并没有在所有的时间完全控制局势，并不是按照他事先计划好的方案进行他的步骤<sup>[7]</sup>。但是此类批驳的杀伤力并不大，因为判定毛是否掌控文革的主观性很大，双方可以各执一词难有定论。

把问题归于“疯子”和“傻子”，认为民众智力低下不是没有理论根据的。与文革研究有密切关系而又被华人学界忽略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社会运动研究的前身是群体行为的研究。早期研究群体行为的学者对参与者是否理智，是否有自我意识持否定态度<sup>[8]</sup>。1895年勒庞发表的《乌合之众》一书对早期的群体行为研究影响巨大。

（笔者提醒读者注意，这是一本120年前发表的书！也请读者记住，12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群体行为的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勒庞在书中反思法国革命以及此后100年来的聚众时代。勒庞试图解释平时遵纪守法的民众为什么会在革命时期做出疯狂的事情来。有些出格的事情是相当恐怖的。他认为聚众对人的思维带来影响，使人

<sup>[1]</sup> 陈子明。2006年/2014年。“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今天》第74期2006年（秋季号）。《昨天》第28期2014年1月。

<sup>[2]</sup> 宋永毅。2008年。“‘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

<sup>[3]</sup> 董国强。2009。“革命？还是帝王政治的回光返照？——毛的最后革命评介”。《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

<sup>[4]</sup> 印红标。1997。“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

<sup>[5]</sup> Wang, Shaoguang. 2003. “The Structural Sourc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Beyond Purge and Holocaust*, ed., by Law, Kam-ye.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pp. 58-91.

<sup>[6]</sup> Benton, Gregor. 2010. “Diss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efore and since the Post-Mao Ref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 1, No. 2 (October 2010), pp. 311-329.

<sup>[7]</sup> CIA. *Intelligence Report: The Role of the Red Guards and Revolutionary Rebels i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Reference Title: POLO XXXIII). November, 1968. Memorandum.

<sup>[8]</sup> DeFay, Jason Bradley.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http://www.weber.ucsd.edu/~jdefey/sm.htm>.

失去平常的判断力，变成野兽<sup>[1]</sup>，成为罪犯<sup>[2]</sup>。洗脑术在现代技术的发展影响更加完善，可以对人进行思想控制<sup>[3]</sup>。伯恩认为社会运动是“无法预测的、不理性的、没有理由的、没有组织性的<sup>[4]</sup>”。

社会学家布鲁默<sup>[5]</sup>及芝加哥派学者（如派克、伯吉斯<sup>[6]</sup>、朗夫妇<sup>[7]</sup>等）深受该派心理学家的影响。布鲁默不认同社会的不公平和冲突会自动地引发民众抗议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论”）。他提出民众是在聚众环境下相互感染，从而情绪化产生群体行为的。民众在互动中的特点是其传染性、循环反应性、模仿性、易受暗示性。由于这些特性，民众的行为是一时冲动的、情绪化的、也是不理性的<sup>[8]</sup>。虽然民众平时是有理性的，能够三思而后行。但是在群体行为的条件下，民众会变得情绪化失去理性<sup>[9]</sup>。斯梅尔塞的原意是反驳布鲁默，提出群体行动是基于“一般化信念”，这些信念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周围的世界，发现社会需要变化的方面<sup>[10]</sup>，但是他的“一般化信念”也是非理性的，所以民众还是不理性的<sup>[11]</sup>。

必须指出的是，勒庞是从一个被革命吓破胆的贵族视角看待法国革命的<sup>[12]</sup>。该派学者（如勒庞、西盖勒<sup>[13]</sup>等）认为民众（包括选出来的议员们<sup>[14]</sup>）的智力实在太低下了，与他

<sup>[1]</sup> 古斯塔夫·勒庞。1999/1895年。《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sup>[2]</sup> Mattelart, Amand and Mattelart, Michele. 1998.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 Short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p. 13.

<sup>[3]</sup> 斯垂特菲尔德，多明尼克。2011年。《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张孝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sup>[4]</sup> Byrne, Paul. 1977. *Social Movements in Britain*. New York, NY: Routledge, pp. 10-11.

<sup>[5]</sup> Blumer, Herbert. 1946/1969. “Collective Behavio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ed., by Lee, Alfred McClung.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pp. 165-221.

<sup>[6]</sup> Park, Robert and Burgess, Ernest.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p>[7]</sup> Lang, Kurt and Lang, Gladys. 1961. *Collective Dynamics*. New York: Crowell.

<sup>[8]</sup> Morris, Aldon D., and Herring, Cedric.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pp. 137-198.

<sup>[9]</sup>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0.

<sup>[10]</sup> Smelser, Neil. 1962.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pp. 8-11.

<sup>[11]</sup> Currie, E and Skolnick, J K. 1970. “A Critical Note on Conception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9: 1(1), pp. 34-35.

<sup>[12]</sup> Cragun, Ryan, Cragun, Deborah, and Konieczny, Piotr. 2010.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 268.

[http://en.wikibooks.org/wiki/Introduction\\_to\\_Sociology](http://en.wikibooks.org/wiki/Introduction_to_Sociology)

<sup>[13]</sup> Sighele, Scipio. 1891. *The Criminal Crowd*. (1892 translated into French). (引自 Mattelart, Amand and Mattelart, Michele. 1998.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 Short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p. 13.)

<sup>[14]</sup> 笔者注：西方人可能认为选出的议员应该不是无脑的群氓。



们的智力不能相比<sup>[1]</sup>。这些学者自命不凡，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概，与坚信“上智下愚”的孔夫子一脉相承，也与自古以来“好为人师”的中国知识份子不约而同。

民众是不理性的理论遭到尖锐的批评<sup>[2]</sup>，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就已经被“不名誉地开除”了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sup>[3]</sup>，淡出研究群体行为的领域<sup>[4]</sup>。针对早期学者提出民众行为是出于非理性的一时冲动，理性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深受约翰·斯图尔特·密尔<sup>[5]</sup>，亚当·斯密斯<sup>[6]</sup>和杰瑞米·边沁<sup>[7]</sup>等人的影响。理性派学者认为，群体抗议行为和社会运动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在常规的政治途径不畅通的情况下，为了达到目标不得不采取的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佳方式<sup>[8]</sup>。尽管该派的学者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程度有差异（如格兰诺维特<sup>[9]</sup>、奥尔森<sup>[10]</sup>、麦卡锡、札尔德<sup>[11]</sup>、蒂利<sup>[12]</sup>、麦克亚当<sup>[13]</sup>、奥伯肖尔<sup>[14]</sup>之间有区别），但是他们在参与抗议和社会运动的民众是否是理性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理性行为”是以可行的、最好的方式达到即定目标的行为，就是说人们的行为是有目的的<sup>[15]</sup>。例如，经商以挣钱为目标，竞选以当选为目的，打仗以战胜对手为宗旨。理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我们的目标。与道德理论不同，理性选择

<sup>[1]</sup> Kurzman, Charles. 2004.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Ir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29.

<sup>[2]</sup> Turner, Ralph and Killian, Lewis. 1972. *Collective Behavior*, 2<sup>nd</sup>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13.

<sup>[3]</sup> Kurzman, Charles. 2004.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Ir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用“不名誉地开除出”（Drum out, 原意为被不名誉地开除军籍）一词。

<sup>[4]</sup> OpenStax College. 2012.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 480. <http://cnx.org/content/col11407/latest/>

<sup>[5]</sup> Mill, John Stuart. 1950. *Utilitaria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p>[6]</sup> Smith, Adam. 1910.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J. M. Dent.

[http://en.wikisource.org/wiki/The\\_Wealth\\_of\\_Nations](http://en.wikisource.org/wiki/The_Wealth_of_Nations)

<sup>[7]</sup> Bentham, Jeremy. 1789.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http://www.earlymoderntexts.com/pdfs/bentham1780.pdf>

<sup>[8]</sup>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48.

<sup>[9]</sup> Granovetter, mark. 1978.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pp. 1420-1443.

<sup>[10]</sup>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p>[11]</sup> McCarthy, John D. and Zald, Mayer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pp. 1212-1241.

<sup>[12]</sup>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sup>[13]</sup> McAdam Douglas.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p>[14]</sup> Oberschall, Anthony. 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sup>[15]</sup> Harsanyi, John C.. 1986.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Rational Behavior.” *Rational Choice*, ed., by Elster, Jon.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P83-84.

理论更注重手段的重要性<sup>[1]</sup>。

理性选择理论可以解释对于局外人来说是非理性的事件。著名的“囚徒困境”是经典的例子。两个合谋的嫌疑犯被抓获处于隔离关押状况。警察没有完全掌握犯案罪证，对他们宣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他们交代并揭发合谋者的罪行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如果一个人交代揭发，另一个人拒绝合作，前者可以从宽当场释放，而后者将会被从严处理判十年徒刑。如果两个人都选择与警察合作，每个人各判5年徒刑。如果两人拒绝与警察合作，由于警察掌握的证据不足，他们俩因为犯有另一个小案子各判8个月。下面的表格总结了他们俩可能的结果。

“囚徒困境”四种可能的结果

	甲交代	甲不交代
乙交代	甲判5年      乙判5年	甲判十年    乙当场释放
乙不交代	甲当场释放    乙判十年	甲判8个月    乙判8个月

两个嫌疑犯被隔离无法串供。他们会做出什么抉择呢？从局外人的角度，他们应该选择拒绝与警察合作。这样他们可以只判8个月，结果是双赢。但是身陷囹圄的囚徒却并不这么想。对于他们来说，虽然拒绝交代可能会获得只判8个月徒刑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获得重判十年徒刑的结果。如果主动交代，最多判5年徒刑，要是运气好的话可以当场释放。所以他们“最合算”的选择是与警察合作揭发同伙争取宽大处理。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选择”会导致“不理性的结果”的原因。

麦克费尔<sup>[2]</sup>指责布鲁默关于聚众行为的理论是“闭门造车”的产物缺乏实际调查。理性行为理论受到了新一代的社会运动理论家的重视。他们是一批参加过抗议活动（如上世

<sup>[1]</sup> Elster, Jon. 1986. “Introduction”, *Rational Choice*, ed., by Jon Elster, Washington Squa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 1.

<sup>[2]</sup> 麦克费尔 (Clark McPhail)。

纪60-70年代学潮、反对越战)的新生代。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相对于勒庞、布鲁默等人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社会运动,他们能以知情者的身份对社会运动进行分析研究,更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麦克亚当对“参与反抗示威斗争的学生是变态”的说法尤为反感。麦克费尔做过实验,证明聚众行为不是一时冲动、没有思考<sup>[1]</sup>。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的平均主义(即“大锅饭”)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中国的百姓并没有被毛和共产党忽悠,并没有听从党的号召和说教,工人和农民普遍出工不出力,为什么?这是百姓理性的表现。百姓所面临的问题与“囚徒困境”中的囚徒遇到的抉择非常相似。如果人人都出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会快速发展,结果是全民都受益。但是如果我一个人不出力,其他人全都出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仍会快速发展,结果大家(包括我)仍受益。因此无论我一个人是否出力,我都可以受益。而如果其他人都不出力,无论我出力还是不出力,我都不能受益。所以作为个人,选择不出力是“明智的”选择。这就是“大锅饭”弊病的根源,因为人人都这么想。为彻底根除这一弊病,激发个人、企业、国家的活力和效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出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在全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随后中国又开始企业改革,打破“大锅饭”,推行经济生产责任制,提高了中国城乡的经济效率。

为什么中国民众在经济生产方面表现得如此“理性”,但是在政治领域(即文革中)却表现得如此“愚蠢”呢?按照布鲁默的解释,人们从理性变化到不理性的过程中有个“转换”。但是他的观点受到了批判<sup>[2]</sup>。事实上,中国民众在文革中的疯狂并非出于愚昧、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理性选择。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还记得全国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如胡平所说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sup>[3]</sup>”。放到现在来看,这些疯狂而又愚昧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不禁会问,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到哪儿去了?但是,假如您身处实境就不会感到奇怪。如果

<sup>[1]</sup>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3-24, 45.

<sup>[2]</sup> McPhail, Clark. 1991.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sup>[3]</sup> 胡平。1996年。“比赛革命的革命: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分析”。《北京之春》(1996年6月号)。

周围的人都在跳忠字舞，都在早请示晚汇报，您敢一个人逆潮流而行，不参加这些活动？人们参与这些荒唐的活动不是愚昧，而是出于自保，是理性的行为。

1968至1970年间，我所在的班级的男生调皮捣蛋、不守纪律、不服从工宣队的管教，在学校里出了名。这是一批“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捣蛋鬼”，令老师和工宣队师傅头疼不已。但是当我们在工厂学工期间全社会掀起跳忠字舞的浪潮时，全班的男生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捣蛋，都乖乖地跟着众人跳起来。因为大家心里明白，谁胆敢在跳忠字舞时捣蛋，后果不堪设想。工宣队师傅正愁找不到藉口“修理”我们。（当然不排除个别聪明的调皮鬼假装学不会，故意跳得东倒西歪，以消极的态度进行抵制。）

文革期间发生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中，有一位年轻的女预备党员因为胆子小不敢杀人，用马刀在死人身上舔了点血回来验刀。结果被人揭发差点没保住党籍，硬是把转正期延长了一年。当一个大队的两个民兵带回区里的指示时，再没有人敢唱反调了。谁都明白，再唱反调，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过来可不是好耍的。杀还是不杀已经不成为问题，讨论的焦点是怎么杀。道县的杀人者中不乏为自保而不得不杀人者，因为谁反对谁就会大难临头，刘香喜因为反对胡乱杀人被抓入牢房关了四年<sup>[1]</sup>。许多人的表现是以攻为守，为了自己不被打，主动地攻击别人<sup>[2]</sup>。

金日成死了之后，朝鲜的民众如丧考妣哭得肝肠寸断。北朝鲜的领导人黄长烨在回忆录中写道：“但当全国齐哭之时，如若我不哭就太危险了。孩子们通过电视看到葬礼后，责怪我哭的太少了。”这是因为有人对金胖子死后人们的表现进行暗中调查。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正在住院却没有立即出院的人受到了处罚。主题科学院的一位博士因为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后还在修理自行车而被处分。在金日成去世那一阵子，哭成了一种竞赛

<sup>[1]</sup> 谭合成。20 十年。《血的神话——西元 1967 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第 96、163、200 页。

<sup>[2]</sup> Thurston, Anne F. 1990. “Urban Viole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o is to Blame?”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by Lipman, Jonathan N., and Harrell, Stevan.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 155.

<sup>[1]</sup>。不哭会受到处罚，哭（哪怕是假哭、装哭）可以躲过灾难，或许还能得到好处，何乐不为呢？朝鲜人的悲天悯地的痛哭是理性的选择，尽管在外人看来滑稽可笑。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都是民众被动地为了自保体现出理性的一面的话，那么文革中“全红总”的举动就绝非是被动自保的问题了。1966年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诞生了。该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试图利用使之成为打手，但是该组织并不热衷于斗“走资派”，而是积极争取与工人有切身关系的经济利益。官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对“全红总”作了这样的评价：由于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讲话煽动临时工、合同工造反，并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工人外出，闹转正，闹复工，闹工资福利待遇，闹增发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等，从而刮起一股经济主义歪风，严重地冲击了国家财政经济<sup>[2]</sup>。由此可见该组织当时的影响力和规模。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1969年夏秋之交的“石拐沟煤矿工潮”。矿务局革委会发现有一份煤炭部文革前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工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工4元）。但是乌兰夫以内蒙财政没钱为由，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消息传开后，全矿5万多职工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因为累计数量庞大，达到1000多万元，矿革委会不敢做主，于是触发了长时间的罢工。全矿职工家属特别团结，原来对立的造反派也捐弃前嫌并肩战斗。在数万工人和家属昼夜围攻之下，革委会被迫同意提款。数万矿工和家人痛痛快快地过了几天大年<sup>[3]</sup>。

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师生在文革前期的造反事件也是民众趁机寻求自身利益的一例。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中央大学和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教职员队伍的政治成份比较“复杂”。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为了加强学校的政治工作，响应毛的关于

<sup>[1]</sup> 黄长焯。2008年。《黄长焯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

<sup>[2]</sup> 方圆。1997年。“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北京之春》（1997年3月号）第46期。

<sup>[3]</sup> 程惕洁。2007年。“四十余年回首看内蒙文革”。《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第87-98页。

高等教育改革的号召，在1966年初提出建立南大溧阳分校的主张，组织文科师生到农村进行所谓的“半农半读”的教学改革。农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文、史、哲三系的500多名师生对此极为不满。文革的爆发为溧阳分校的师生带来了契机，溧阳分校立即出现大字报，指责溧阳分校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必须指出，是毛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学校搬到农村与工人农民相结合是为了实现毛防止修正主义的战略。溧阳分校的师生牵强附会地把防修反修的措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产物，不失为专制制度下“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一着妙棋<sup>[1]</sup>。此举激怒了匡亚明，于是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战。不幸的是，匡亚明积极贯彻毛的主张，“反对那些自私自利的批评者”，结果却沦为文革的牺牲品，成为文革初期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sup>[2]</sup>。南大溧阳分校的师生利用文革反对匡亚明执行毛的教育改革是源于私利还是出于公心读者自有公断。

如果说“全红总”、“石拐沟煤矿工潮”和“南大溧阳分校事件”中的民众是出于生活、经济利益的话，那么发生在南京的王金事件调查团则是典型的出于政治利益的例证。以查全华等人为首的“9·28调查团”主动出击，向贵族红卫兵的暴行愤怒地反击。民众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不满一发不可收拾地渲泄出来。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数万民众聚集在南京外国语学校连日举行群众大会，控诉贵族红卫兵的暴行，有人甚至扬言要拆毁学校的教学大楼（笔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绝非毛的蛊惑所致。造反的工人们甘冒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宁可被扣发工资，也要为死去的工友讨个公道。他们的所做所为决非毫无目的。事实上，由于王金脾气暴躁，生前与同事的关系并不很融洽。王金生前的工友们不计前嫌，不计个人恩怨，不计个人得失，趁机造反将矛头指向贵族红卫兵，指向他们痛恨的省委、市委的官僚。

即使是持“一个文革说”的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文革中民众诉求自身利益的现象<sup>[3]</sup>。

<sup>[1]</sup> Perry, Elizabeth J. 2007.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China Journal*, 57, pp. 1-22.

<sup>[2]</sup>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01.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pp. 1-26.

<sup>[3]</sup> 徐友渔。1996年。“关于‘两个文革’说”。《中国研究》。日本（1996年8月），第17期。

金春明认为“两个文革说”把文革按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研究，将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领导和群众，工人和农民，造反派和保守派，红五类和黑五类等等加以区别，他们参加文革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利益等。这些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sup>[1]</sup>。

坚持民众是非理性的社会运动理论淡出研究领域至今已经有40多年了<sup>[2]</sup>。该派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重返舞台东山再起，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是在过去的40多年间新出现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再也没有谁敢把民众假设成是一群智力低下、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利益诉求、任人欺骗的傻瓜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在专制制度下的反抗运动，匈牙利政治学家托克斯提出需要区分“反对党”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差别。反对党公开企图取而代之夺取政权，而持不同政见者仍然忠于现政权，只是对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提出批评意见。持不同政见者是“体制内的反对派”，通过改革扩大民主，改善以至最后消灭专制体制<sup>[3]</sup>。另一位匈牙利哲学家泰拉斯提出，持不同政见人士大张旗鼓地行使合法的权力，避免公开的煽动性口号，采用流行的社会批评，故意混淆他们自己的观点和官方准许的批判（官僚）<sup>[4]</sup>。这是专制条件下反抗运动的特色。

上述运动的持续时间有的并不长，有的甚至昙花一现。这是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结果。西方民主国家中，社会运动的持续时间短则数年，长则十多年甚至数十年。一党专制的国家不可能允许人民自由结社、自由集会，也不可能允许社会运动（无论是出于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或其他的目的）的存在。1989年发生的血腥镇压学生暴行使得6·4民主运动仅存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至今为止还没有人以持续的时间不长为藉口而否认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全红总”，“9·28调查团”，溧阳分校“造反”持续的时间不长，否认它们在争取民众的经济利益、生活利益和政治利益上的意义。至少它们可以算作民众争取自身利益的抗议活动。而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抗议活动（如

<sup>[1]</sup> 金春明。1998年。“‘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sup>[2]</sup> Turner, Ralph and Killian, Lewis. 1972. *Collective Behavior*, 2<sup>nd</sup>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13.

<sup>[3]</sup> Tökés, Rudolf L. 1974. “Dissent: The Politics for Change in the USSR”.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1970's*, ed., by Morton, Henry W., Tökés, Rudolf L. and Hazard, J. 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3-59.

<sup>[4]</sup> Tarás, G. M. 1993. “The Legacy of Dissen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4th May, pp. 14-19.

示威游行、静坐、堵塞交通、罢工、签名请愿、占领街区等），社会运动使专制国家向民主化发展<sup>[1]</sup>。

诚然，单纯的理性选择理论在分析和解释社会运动方面也有问题，这就是“免费搭乘者”的问题。群体的理性行为基于一个假设，当人们认识到自身利益是共同利益的一部分时，人们会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但是这种思想觉悟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从个人的理性角度出发，其他人都参加社会运动承担可能的风险，而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做“下山摘桃派”最理性。如果运动成功了，个人可以坐享其成；如果运动失败了，个人毫发无损。所以奥尔森说过，除非群体非常小人数很少，除非有特殊的机制强迫个人参加争取共同利益的运动，否则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是不会为争取共同利益而献身的<sup>[2]</sup>。这也是为什么坚持“民众是理性的”学者在运用理性理论的程度有所不同的原因。该派学者提出了基于民众理性的不同的社会运动理论。因为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讨论过许多社会运动的理论，而此处主要讨论民众是否理性的问题，“免费搭乘者”的问题就不赘述了。

## 二. “两个文革说”的缺陷

“两个文革说”也有问题。它的第一个缺陷是其理论上的问题。“两个文革说”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论”。西方学者李鸿永在1978年的分析中<sup>[3]</sup>，陈佩华等在分析广州红卫兵的造反运动<sup>[4]</sup>时均运用了“社会冲突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社会运动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sup>[5]</sup>。马克思主义的

---

<sup>[1]</sup> Porta, Donatella D. and Diani, Mario.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sup>nd</sup>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p. 166, p. 249.

<sup>[2]</sup>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2.

<sup>[3]</sup>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up>[4]</sup>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1980), pp. 397-446.

<sup>[5]</sup> Cox, Laurence and Nilsen, Alf Gunvald. 2005. “‘At the Heart of Society Burns the Fire of Social Movements’: What Would a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Look Lik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ternative Futures and Popular Protest*, ed., by Barker, Colin and Tydesley, Mike,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 1. <http://eprints.nuim.ie/460/>.



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但是这一交换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成为他们的利润。由于激烈的竞争，资本家不得不逐步降低商品价格。资本家把损失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使工人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差。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与生产的商品发生了异化。工人在工会的带领下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些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是社会运动。只要资产阶级掌握权力一天，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

该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的平等必将导致革命运动的爆发。阶级利益是社会运动的核心。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像物理和自然科学能够可靠地预测自然现象那样，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科学地预见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因素，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马克思和恩格斯预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提出资本主义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这就是由工人组成的社会运动，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最终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冲突论”的潜台词是社会冲突必将导致革命运动的爆发<sup>[1]</sup>。

由于受“必然性”的影响，持“社会冲突论”的学者往往把文革中的矛盾归咎于集团利益冲突。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激进派中出身不好的占多数<sup>[2]</sup>。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sup>[3]</sup>。

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的“自动爆发”的观点受到了其他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其中的一位是卢卡奇<sup>[4]</sup>。他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卢卡奇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物化意识形态和阶级觉悟的论述。关于阶级觉悟，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只有自发的阶级意识，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自觉的阶

<sup>[1]</sup>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15.

<sup>[2]</sup> Lee, Hong Yung. 1978.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5.

<sup>[3]</sup>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tember 1980, pp. 397-446.

<sup>[4]</sup> 捷尔吉·卢卡奇 (Georg Lukacs, 1885年4月 - 1971年6月)，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

级意识。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换言之，阶级斗争必须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意识目标和阶级觉悟的高度。

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葛兰西<sup>[1]</sup>摒弃了资本主义灭亡是自动的、不可避免的和历史必然的观点。他强调，群众必须行动起来进行社会革命。要进行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觉悟，而群众觉悟的提高不是自动的。因此无产阶级的精英（即无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率先产生阶级意识，然后推广到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中去，进而推动革命向前发展<sup>[2]</sup>。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论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应该不会陌生。葛兰西的提高群众觉悟的观点让人想起文革中常讲的对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说法。

文革中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产生的。为什么文革前17年这些矛盾并没有导致民众大规模的反抗？毛在文革初期不得不想方设法发动群众说明了文革造反运动启动的困难。正如麦克亚当指出的，结构条件并不能自动导致民众的反抗<sup>[3]</sup>。“社会冲突论”所坚持的必然性遇到了无法解释的困境。对于这一情况，“资源动员论”显示出了优越性。该理论认为运动的发起不仅需要存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还需要社会资源。“政治过程论”强调不仅需要民众的反叛意识还需要政治机会。毛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敌，放松了官方对民众的控制，绕开各级党组织鼓动民众起来造反，民众有了额外的机会，运动才发动起来。

“新社会运动理论”强调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追求，跳出了过去的经济范围。尽管文革中曾出现过一些“经济主义”运动，但是民众更多地关心政治问题。

简单地把阶级背景与民众在文革中站边的问题联系起来的“社会冲突论”遭到了质疑，林伟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中不同派别的冲突不是社会冲突而是思想理论上的冲突<sup>[5]</sup>，向前认为群众的行为受政治身份体系内的地位制约<sup>[6]</sup>，福斯特对浙江两大派别的政治立

<sup>[1]</sup>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年1月- 1937年4月）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

<sup>[2]</sup> Ritzer, George. 1988.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pp. 126-129.

<sup>[3]</sup> McAdam, Douglas.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48-51

<sup>[5]</sup> 林伟然/李玉华译。1996年。《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sup>[6]</sup> 向前。2010。《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记忆》第85期。

场和省委领导主要成员的背景研究的发现<sup>[1]</sup>，佩里和李逊对上海工人运动中派性问题的研究<sup>[2]</sup>，魏昂德对北大红卫兵的研究<sup>[3]</sup>，董国强和沃德对江苏文革运动的分析<sup>[4]</sup>，均有异于“社会冲突论”的观点。

由于“社会冲突说”存在的缺陷<sup>[5]</sup>，在非经济因素和非阶级冲突为主的社会运动中，该理论的运用受到了限制<sup>[6]</sup>，特别是“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出现，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冲突论”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失去了往日的威力<sup>[7]</sup>。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社会学教科书里的社会运动章节中，“社会冲突论”已经不再出现了<sup>[8]</sup>，仅在社会运动理论专着中作为历史介绍而出现<sup>[9]</sup>。

令人费解的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极力贬低人民群众的觉悟，不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论”，却相信一个被法国革命吓破胆的法国贵族提出的“乌合之众论”；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学者却相信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坚信人民群众的觉悟。

“两个文革说”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错误的定位。“两个文革说”最先是由王希哲在1981年提出来的<sup>[10]</sup>。王提出了与“毛的文革”相对立的“人民文革”<sup>[11]</sup>。也有人说是刘国

<sup>[1]</sup> Forster, Keith.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E: Sharpe.

<sup>[2]</sup> Perry, Elizabeth J. and Li, Xun.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39-69.

<sup>[3]</sup> Walder, Andrew. 2006.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China Quarterly*, 188(1), pp. 1023-1047.

<sup>[4]</sup>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01.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pp. 1-26.

<sup>[5]</sup> Porta, Donatella D. And Diani, Mario.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sup>nd</sup>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p. 6.

<sup>[6]</sup> Morris, Aldon and Herring, Cedric.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p. 4.

<sup>[7]</sup> Habermas, Jurgen.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2 Vols. Vol. II.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350.

<sup>[8]</sup> Macionis, John. 1991. *Sociology*, 3<sup>rd</sup>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Macionis, John. 2012. *Sociology*. 14<sup>th</sup> Edition.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sup>[9]</sup> Edwards, Gemma. 2014.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Aldon and Herring, Cedric. 1987.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sup>[10]</sup> 徐友渔。2007年。“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第594-606页。

<sup>[11]</sup> 王希哲。1981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月刊》（1981年2月刊）第49页。

凯首先提出“两个文革说”的<sup>[1]</sup>。支持“两个文革说”的有胡平、王绍光、杨小凯（又名杨曦光）、刘国凯、郑义等人。杨小凯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提出毛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人民对刘邓政治迫害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运动<sup>[2]</sup>。王绍光提出证明群众组织自主性的论据，认为不是文革运动受制于毛，而是毛受制于他所发动的运动<sup>[3]</sup>。刘国凯则提出人民文革实际是民众的反抗运动，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sup>[4]</sup>。最激进的要属郑义。他提出，除了毛的文革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争取自身权力的不自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郑义宁愿把“人民文革”定性为中国当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而不同意把人民大众投入文革理解为一种愚昧无比的“大疯狂”，理解为一种上当受骗的毫无主体精神的被动<sup>[5]</sup>。

“人民文革”的全称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该名称造成了歧义。正如“毛文革”或“党文革”一样，文革中发生的运动与革命无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定位“革命”使自己陷入无法自证的境地。更遗憾的是郑义把“人民文革”视为一次“人民的起义”。这种作法无异于授人以柄，为“一个文革说”者留下了口实。当“一个文革说”批驳“人民文革”是“奉旨造反”时，“两个文革说”的反驳竟是：“奉旨造反”也是造反<sup>[6]</sup>，显得有气无力。如果持“两个文革说”的学者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文革中民众的造反行为是社会运动理论中常见的“改革运动”，那么他们就理直气壮得多，遇到的阻力会比现在要小得多。郑义的“起义说”过于激进，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使人难以接受，成为“一个文革说”学派的众矢之的。真理向前一步是谬误。不幸的是，郑义在“人民文革”已经错跨了一步的情况下，又跨了一步。

<sup>[1]</sup> 徐友渔。2011年。“‘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共识网》（2011年10月18日）。

<sup>[2]</sup> 杨小凯。1990年。“六四省悟：反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国之春》（1990年8月刊）第42-43页。

<sup>[3]</sup> 王绍光。1991年。“群众与文化大革命”。《大陆知识份子论政治、社会、经济》李少民编。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第90-94页。

<sup>[4]</sup> 刘国凯。2006。“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北京之春》（2006年1月）第152期。

<sup>[5]</sup> 郑义。1996年。“两个文化大革命杂议”。《华夏文摘增刊》（1996年4月）第83期。

<sup>[6]</sup> 郑义。199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北京之春》（1996年）第42期。

“两个文革说”的第三个缺陷是其自身无法摆脱的逻辑矛盾。“两个文革说”承认有两个文革：“毛文革”（或“党的文革”）和“人民文革”，即：“毛文革”是文革，“人民文革”也是文革。“毛文革”是十年，“人民文革”是三年。“文革是三年”的结论必须基于另一个条件：文革是“人民文革”。以下是“两个文革说”关于“文革是三年”的推理：

“毛文革”是文革。（十年）

“人民文革”是文革。（三年）

文革是“人民文革”。（三年）

以上的推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项不周延，文革是两前题的中项，犹如“桥”联结两个命题。三段论规则之一：从前题中的“中项”必须至少周延一次，方可成有效推论。一个不支援中项周延性的论证结构必然是无效的<sup>[1]</sup>。第二个问题与结论有关。三段论里不周延的中项不应出现在结论中。因为中项（即“桥”）只能当“桥”用，不能作为结论中的主词或谓词。“桥”联结作用一完，就没它的角色了。文革是“人民文革”为结论，中项（文革）出现在结论中了。举一个通俗的确例子说明上面的问题。

男人是人。

女人是人。

人是男人。

“两个文革说”坚持“文革是三年”与上面“人是男人”犯的逻辑错误是一样的。“两个文革说”明明声称有两个文革，但是在分期上却只考虑一个文革，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喜东也许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他坚持“文革两年说”又反对“两个文革说”<sup>[2]</sup>。在这一点上，“一个文革说”（无论其学说是否正确）的逻辑是正确的：只有一个文革，时期是十年。西方学者的“文革三年说”逻辑上也没有问题：文革是社会运动，该运动仅持续

<sup>[1]</sup> 麦克伦尼, D. Q.。赵明燕译。2007年。《简单逻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5页。

<sup>[2]</sup> 喜东。1996年。“‘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华夏文摘增刊》（1996年4月）第83/84期。

了三年。可是“两个文革说”明明白白地说有两个文革却又无视另一个文革的存在，坚持文革只有三年，缺乏逻辑性。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概念上的混淆。西方学者讲文革指的是社会运动；“一个文革说”讲文革指的是“毛文革”或“党文革”；“两个文革说”讲文革指的是“人民文革”。如果该派学者明确地提出，群众造反是社会运动（不用“两个文革”的说法），而这一社会运动为期三年，那么在逻辑上也行得通。

### 三. 文革的定义：内乱、运动、游戏、博弈？

“两个文革说”在坚持群众运动的独立性方面略胜于“一个文革说”，但是“两个文革说”从坚持群众运动的“独立性”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孤立性”，又输于“一个文革说”。“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的主要问题分别在于，前者否认文革造反运动的“独立性”，后者担心造反派被妖化过分强调其独立性走向了“孤立性”。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二：首先，在研究文革的华人学界中，大多数学者是史学家（如王年一、金春明、席宣）、哲学家（如严家其<sup>[1]</sup>、胡平、徐友渔）、政治学家（如杨小凯、王绍光）、语言学家（如徐贲），和理工科学者<sup>[2]</sup>（如陈子明、刘国凯）等。由于受学术背景的限制，华人学界的学者们对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理论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学科。社会运动理论领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异军突起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没有引起华人学界的重视。这一忽视导致了文革造反运动归属方面的无谓争论。文革的造反运动属于社会运动领域里的“改革运动”，而党的运动不属于社会运动范畴，两者不可混淆。这些对于西方学术界是很简单的问题成了华人学界里争论不休的难题。

其次，支撑“一个文革说”和“两个文革说”的理论基础均存在着软肋。“一个文革

<sup>[1]</sup> 严家其是社会科学家，曾学习过物理，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sup>[2]</sup> 这里指学者所受的正式教育。他们后来都成为出色的政治学者、哲学家等。

说”基于“乌合之众论”，认为民众或是不明真相受骗上当，或是情绪冲动狂热盲动、或青春期躁动心理<sup>[1]</sup>。殊不知自命不凡的“乌合之众论”早已成为过了气的理论。说得客气点是“淡出”，说得不好听点是“被赶出”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一个文革说”基于一个错误的已经被摈弃的理论。而“两个文革说”基于的“社会冲突论”把社会冲突与社会运动机械地联系在一起，受到社会运动理论界的批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多种理论取代“社会冲突论”。

那么文革到底如何定义呢？在定义文革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中国是“党天下”的专制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有着诸多的不同。最重要的一个差别是民主运动的生存条件。中共历来实行禁言禁党的政治高压政策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草根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无法有效地向民众传播自己的主张，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几乎不可能，自发和自主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得益于当时的统治阶层的动摇和开放。在极权国家里，草根运动的出现和壮大有赖于当局像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南非白人政权那样能够守住道德底线。文革中的造反运动虽然有独立性，应该与党的运动区别对待，但是造反运动并不像西方国家里的民主运动那样享受真正的自主权，并不完全独立。当然必须强调，这种半独立性的特点是由于专制体制造成的，并非源于民众的愚昧和非理性。

中共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定义文革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乱”与“治”相对，是个贬义词。中国历史上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皇之治”，也有“安史之乱”、“八王之乱”、“黄巾之乱”、“太平天国之乱”。把历史的一个时期说成“乱”一般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出现叛乱，统治者要么动用武力平定叛乱，要么被造反者推翻。定义文革为“内乱”具有明显的政治立场，缺乏中立性和客观性。

<sup>[1]</sup> 董国强。2006年。“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二十一世纪》网路版（2006年7月）第50期。

国内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们对“内乱”的定义也不满意，他们对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sup>[1]</sup>；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sup>[2]</sup>。也有学者指称文革是事件<sup>[3]</sup>。徐友渔在一次讲话时也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发生的政治事件”<sup>[4]</sup>。

除了定义文革为“内乱”、“运动”和“事件”以外，陈子明提出与其说文革是一场革命，不如说它是一场“白相人<sup>[5]</sup>”的游戏：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毛泽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还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由于有众多的参与者，毛在文革中不得不搞了三个平衡运动：“毛文革”与毛党魁之间的平衡；“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平衡（以江青为主要代表的“文革派”始终只是一批高级“白相人”）；在群众领袖（发动群众）与群众屠夫（镇压群众）之间的平衡。毛的文革把“走资派”作为运动的主要对象，后者不甘于束手就擒，自然要进行抵抗。“走资派”的抵抗运动是反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sup>[6]</sup>。尽管在许多方面与陈的观点相左，武振荣提出的“三个运动说”（人民群众运动、毛泽东运动、共产党运动<sup>[7]</sup>）却与陈子明的提法异曲同工。

武振荣的“三个运动说”和陈子明的“三个平衡运动”揭示了文革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文革中的民众可分为：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中共党内也分为：激进派（包括毛）、温和派和保守派。六方集团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如金春明说的那样，斗争是特殊的、错综复杂的<sup>[8]</sup>。

虽然笔者不同意陈子明关于“骗子”、“疯子”和“傻子”的“三子”说法，但是陈子明提出的“游戏说”独树一帜。尽管赞同者甚少，“游戏说”却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

[1] 金春明。1995年。“前言”。《“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 高皋、严家其。198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页。

[3] Episode 和 Event。White, Lynn T.. 1989. *Politic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徐友渔。2011年。“西方跟中国的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大学论坛》第48期。

[5] “白相”在上海话中表示“玩”的意思。“白相人”一般来说是个贬义词，有点不务正业的意思。如曾威震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在上海人眼里就是“白相人”。

[6] 陈子明。2014年。“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昨天》（2014年1月）第28期。

[7] 武振荣。2005年。“解读金春明教授关于‘文革’的定义”。《华夏文摘增刊》（2005年8月）第452期。

[8] 金春明。1995。“前言”。《“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思路。游戏在英语中既可译为 Play（以下称“前者”），也可译为 Game（以下称“后者”）。陈子明倾向于把游戏理解为“前者”。按照陈子明的观点，孩子“过家家”和情侣“花前月下”属于“前者”，而体育运动、棋牌游戏、电脑游戏等属于“后者”。“前者”是无规则的或者是自定规则的游戏，“后者”是有前定规则或外在规则的游戏。毛泽东只许别人按照他制定的规则玩，而他本人却并不遵循任何规则（包括他自己制定的规则）<sup>[1]</sup>。

玩耍和游戏是哺乳动物皆有的本能<sup>[2]</sup>。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人类文化中的主要构成因素<sup>[3]</sup>。最早对游戏进行研究的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格鲁斯提出“游戏是学习”的理论<sup>[4]</sup>。对游戏有些偏见的瑞士哲学家和心理家皮亚杰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娱乐的、好笑的游戏是没有意义的、是浪费时间，只有认真的游戏才是有用的<sup>[5]</sup>。美国的社会学家米德提出孩童是通过游戏学会理解社会的。“前者”和“后者”的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的人数，二是有无规则。“前者”可以一个人玩，没有什么规则；而“后者”是多人游戏，需要有规则。更重要的是，在“后者”的游戏中每个孩童必须理解相互间的行为。由于规则的存在，孩童学会了站在别人立场上思维以及如何做出反应。也就是说，每个人能采取“概括化他人”的态度<sup>[6]</sup>。法国的社会学家凯鲁瓦提出类似的测定标准：自由和限制<sup>[7]</sup>。鲍尔把“后者”分为4类：1. 技术性的；2. 策略性的；3. 机遇性的；4. 以及上述类别的各种组合<sup>[8]</sup>。

由于语言的原因，不仅中文而且其他语言（如德文）也很难区别游戏的两种意义<sup>[9]</sup>。

<sup>[1]</sup> 陈子明。2014年。“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昨天》（2014年1月）第28期。

<sup>[2]</sup> Fog, Agner. 1999. *Cultural Selection*. Norwell,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 222.

<sup>[3]</sup> Wikipedia Huizinga, Johan. 1938. *Homo Ludens (Man and Players)*, cited from Wikipedia.

<sup>[4]</sup> Groos, Karl. 1898. *The Play of Animals*,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L. Baldwin. New York: Appleton.

[https://www.brocku.ca/MeadProject/Groos/Groos\\_1898/](https://www.brocku.ca/MeadProject/Groos/Groos_1898/)

Groos, Karl. 1901. *The Play of Man*,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L. Baldwin. New York: Appleton.

[https://www.brocku.ca/MeadProject/Groos/Groos\\_1901/](https://www.brocku.ca/MeadProject/Groos/Groos_1901/)

<sup>[5]</sup> Fog, Agner. 1999. *Cultural Selection*. Norwell,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 3.

<sup>[6]</sup> Mead, George Herbert. 1934/1962.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34.

<sup>[7]</sup> Caillois, Roger. 1958/1961. *Man, Play, and Gam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up>[8]</sup> Ball, D. W. 1972. “The Scaling of Gaming: Skill, Strategy, and Chanc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5, pp. 277-294.

<sup>[9]</sup> Hinske, Steve, Lampe, Matthias, Magakurth, Carsten, and Röcker, Carsten. 2007. “Classifying Pervasive Games: On Pervasive Computing and Mixed Reality”.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for Pervasive Games: A Reader*

根据以上西方学者的讨论，中文似乎可以把“前者”译为“游戏”，而把“后者”译为“博弈”（或竞赛、竞技）。博弈狭义上说是下棋，广义上可以指赌博和为谋取利益而进行的争斗。游戏是为了娱乐，博弈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赛、竞争、搏斗。对应鲍尔对“后者”的分类，博弈可以理解为：第1类指的是竞赛（如球赛、棋赛），第2类指的是为谋取利益的斗争，第3类指的是赌博。

现代数学中的博弈论<sup>[1]</sup>是应用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在多个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具有相互作用时，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理论。目前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许多学科有着广泛的应用。博弈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sup>[2]</sup>。

博弈论的历史并不长，从1944年冯·诺伊曼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着《博弈论与经济行为》<sup>[3]</sup>至今不过70多年的时间，但是博弈论发展迅速，已有9位学者因采用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生物学奖。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博弈论的运用有了可喜的发展。例如华裔学者在天安门事件的研究中采用博弈论<sup>[4]</sup>并引起了关注<sup>[5]</sup>。

文革涉及全中国的亿万民众和中共的各层官僚，把为时多年的声势浩大的事件说成是一场以娱乐为目的的游戏情理上说不通。文革更像是游戏的后一种解释：博弈。文革是一场为谋取利益的斗争，是诸多的决策主体根据掌握的信息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决策的一场经济和政治斗争。

当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定，博弈属于合作博弈。如果没

---

*for Pervasive Gaming Research*, vol. 1, ed., by. C. Magerkurth, C. Röcker. Shaker Verlag, Aachen, Germany, pp. 11-38.

<sup>[1]</sup> “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赛局理论”。

<sup>[2]</sup> Wikipedia. “Game Theo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me\\_theory](http://en.wikipedia.org/wiki/game_theory).

<sup>[3]</sup> Neumann, John von and Morgenstern, Oskar. 2007.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60<sup>th</sup> Anniversary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p>[4]</sup> Deng, Fang. 2011. *Unintended Outcomes of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NY: Book Now, Ltd.

<sup>[5]</sup> Zhao, Dingxin. 2011. “State Legitimacy and Dynamics of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East Asian Social Movements: Power, Protest and Change in a Dynamic Region*, ed., by Broabent, Jeffrey and Irockman, Vicky.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p. 386.

有，博弈就是非合作博弈。从行为的时间序列性上看博弈又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或虽然并非同时选择，但是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如“囚徒困境”属于静态博弈。动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而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如下棋和打牌属于动态博弈。按照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博弈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在博弈过程中，每一位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策略及收益有准确的信息。如果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准确，博弈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sup>[1]</sup>。

那么文革属于哪一类博弈呢？董国强在评论《毛的最后革命》一书时说，尽管中共高层干部中的“幸存者”、“受益者”和“激进派”三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竭力逢迎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毛深谙帝王御臣之术，绝不轻易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有时还会故布疑阵以考验其下属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担当重任的党政要员的政治活动从整体上堕落为一种“猜迷”和“赌博”的游戏。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打探和揣摩毛的“圣意”上。有些人因猜错毛的意图而受到清洗；有的人虽然猜对了，但是事后却当作替罪羊也遭受厄运<sup>[2]</sup>。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注意到毛的个人意志反复无常的现象<sup>[3]</sup>与此有关。白霖认为毛的政策飘忽不定、很难预测，有助于阻吓民众<sup>[4]</sup>。

白霖和罗金义在评论福斯特对浙江省文革的研究中指出，毛在对江华的态度上含糊不清，后来江在浙江的支持率下降，终被毛抛弃。现在弄不清楚到底是因为毛不支持江华导致后者下台，还是由于地方上的不支持导致毛放弃江。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也许会成为永远的迷。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毛因为在许多事情上含糊不清而受益匪浅<sup>[5]</sup>。

[1] Wikipedia. "Game Theo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me\\_theory](http://en.wikipedia.org/wiki/game_theory).

[2] 董国强. 2009. “革命？还是帝王政治的回光返照？——毛的最后革命评介”。《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

[3] 董国强. 2006年. “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二十一世纪》网路版(2006年7月)第50期。

[4] White, Lynn T.. 1989. *Politic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9.

[5] White, Lynn T. and Law, Kam-ye. 2003. "Introduction: China's Revolution at its Peak". *Beyond a Purge and a Holocaus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ed., by Kam-ye La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文革属于不完全信息的博弈。中共的保守派和温和派对毛的目的并不清楚。毛对中共的保守派尤其防备，保守派对毛的意图不甚明了，以至于保守派在文革一开始处处被动，几乎全军覆没。同样，民众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对毛的意图也不甚理解，所以迟迟不敢有所动作。毛不得不千方百计动员民众起来造反，达到他的目的。

文革的前三年中，激进派和温和派（党内外）联合起来对付保守派（党内外），保守派（尤其是党内保守的当权派）无情地镇压民众的激进派，当保守派垮台后民众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内部分裂打派仗<sup>[1]</sup>，有的民众保守派为了自保，不得不打击曾经的同盟——党内保守派<sup>[2]</sup>，有时候保守派下手更狠，原因之一是为了洗刷保皇的名声，表示自己也是响应毛的造反号召<sup>[3]</sup>，同时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sup>[4]</sup>。毛通过用军队依靠“三支两军”的方式控制群众组织，用文革中的新文官（如张春桥和王洪文等人）入主军队制衡军队中的保守派，用民众反对保守派<sup>[5]</sup>。毛泽东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又不行；依靠工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sup>[6]</sup>。保守派失势以后，党内的激进派分裂，林彪集团倒台是激进派内部分裂的结果。与此同时，民众的激进派受到残酷的整治。文革的后7年是党内的激进派、温和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最终以党内激进派失败而告终。文革是一场混战，六方集团没有固定的同盟，没有长久的利益，没有真心的合作，各打各的算盘，是一场非合作式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谈不上谁利用了谁<sup>[7]</sup>。文革中的六方集团是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

本文对文革的定义是：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此期间，党内的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民众的激进派、温和派、保守派六个

[1] 刘国凯。1997年。“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中国之春》（1997年）第2期。

[2] Dong, Guoqiang and Walder, Andrew W. 2001.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pp. 1-26.

[3] 阿陀。2013年。“文革的十年，武斗的十年——为纪念文革四十七周年而作”。《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4] 阎阳生。2014年。“文革呼史志：红卫兵缘起、暴力与终结”。《中国禁闻-禁书网》（2014年11月23日）。  
<http://www.bannedbook.org/>。

[5] 朱嘉明。1996年。“三十年后思考文化革命的几个问题”。转自《华夏文摘增刊》（1996年）第97期（原载《新闻自由导报》第207期）。

[6] 叶永烈。1995。《文革名人风云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第278页。

[7] 阎长贵。2011年。“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记忆》第78期。

集团进行了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文革以群众造反兴起，激进派与保守派斗争，党内保守派的失势开始，继以民众激进派失利受整，最后以激进派的失败而告终。如果说陈子明提出的是“游戏说”，那么本文提出的文革定义可以简称为“博弈说”。

温州军分区司令王福堂在文革中遭难时曾对造反派明言：“文革后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果然，邓小平时代王福堂以老病之身升任浙江军区第一副司令<sup>[1]</sup>。当1968年清华附中的学生们面临上山下乡运动即将分手时，在八达岭长城上郑义班上两位个人关系甚好却分为两派的同学要分手了。袁东平（当时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之子）环视辽阔壮美的一派北国风光，爽朗地说：“将来，你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宋海泉（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生之一）不解地瞥他一眼。袁东平气派大方地拍拍老同学的肩，把话说得更加明确：“中间派没什么大出息，你们井冈山的行，但你们一般出身于知识份子和平民家庭，你们距离权力太远。而我们‘老兵’离权力很近，我们和权力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只能是这样了：由我们来掌权，你们来给我们好好建设！……别不服气，不信再过二十年看看！”<sup>[2]</sup>文革最后的结局印证了王福堂和袁东平的预言。总而言之，文革是一场不对称的博弈。■

此文摘自《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一书（台湾，博客思出版社，2015），《昨天》第65期曾在“书海泛舟”专栏中介绍过此书。

<sup>[1]</sup> 宋宏亮。1998年。“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华夏文摘增刊》第158期（1998年11月）。

<sup>[2]</sup> 郑义。199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北京之春》第42期（1996年11月）。

【宇清谈画】

## 那些年，我们是怎样画画的（二）

——再见，画里童年

王宇清

真的，不知从何时起，记忆里的“孩子围着大人转”的场景，已不觉间换成了“大人围着孩子转”的司空见惯了。

我常常想，如今的孩子和大人关系，和几十年前究竟有何不同？今天儿童无疑越来越成为家庭甚至社会之“绝对中心”，是否这已使我们伦理的秩序发生了重大逆转？

成年人与孩子间的这种新关系，似乎正在重构着人伦间新的秩序乃至新的文化生态。



从

从小孩围着大人，到大人围着孩子

对于社会，究竟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我们通过回顾昔日一度风行国中的美术张贴，来看看这类以时代风尚为主要描绘内容的“张贴画”里面，将记录怎样一些和当下大异其趣的生活。笔者很愿意和有兴趣的同好分享，那将是藏在老画纸中别开生面的另一种童年。

“多子多福”这种曾经颇为流行的风俗与观念，我想一多半的起因是过去的儿童存活率曾经很低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在过往的数千年历史中，因为早夭的概率极高，故而那时的风俗都鼓励多生，就好像要多一些“备胎”似的，仿佛不唯此就难保人丁的兴旺，就不能维持家族之绵延。所以，上面的两幅画，可以看成是这种自古而然的风俗在那个时代的民众中是多么的受到支持和认同。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有句著名的口号：“人多力量大！”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国家开始推行鼓励节制生育，提倡“二胎为佳”的新政策为止，多子多福，一直获得官民的广泛共识，年画中多子画面的大量出现，好像也在反复为这句口号的政治正确背书。

反观当下，文化的生态则已大为不同，“多子文化”被迫演化为“独生子女”文化。这样另一种文化偏执开始愈演愈烈，即家庭以晚辈为中心的“伦理倒挂”。“伦理倒挂”扭曲了伦理原有的秩序，家长每以当孩子的“卫星”为乐。我们看到时下之大人每每都热衷于围绕孩子，在团团乱转中，有些家庭里孩子俨然已貌似一家之主了。天伦关系错位，道德秩序就难免要混乱；社会人际间的“倒挂”关系也便随处可见了。

孩子问题，实际是个成人的问题。无论“多子多福”也好，也无论“独生子女”也罢，总之意识形态安排决定着一切，这在中国，就叫做“政治挂帅”。就如同几十年来无数年画或宣传画里面的儿童，他们总须按照各种需要，被赋予种种不同的形象。他们有时被用做政府订制的宣传美术中的形象符码，又或宣传官员头脑中随时变换的概念与象征，甚至常常会化身为一些画家作品中，那些按需打造并可根据政治风向任意调整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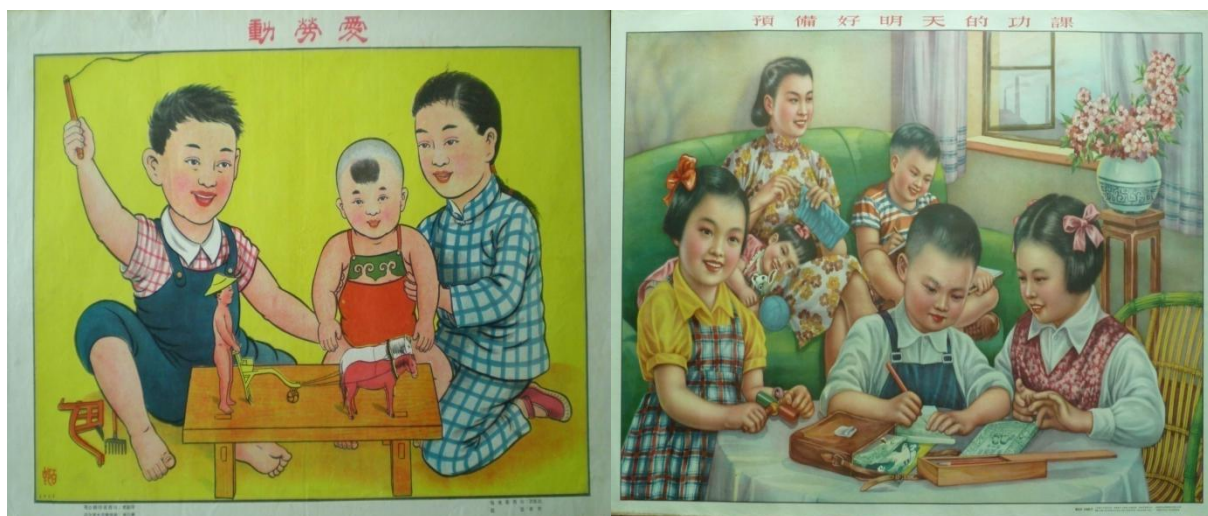
历史的有趣就在于，它有时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与现实中的我们邂逅。

### “兄弟姐妹”的今与昔

在过去，一个普通人家大都有着众多的兄弟姐妹，这在昔日的中国社会寻常而普通。而时至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家庭“组合”已变得稀罕。与此相关，在当代汉语中，“兄



弟姐妹”之称谓，越来越多时候不再与血缘相干了。现而今，人际交往实际中的“姐妹”



对这种亲属概念的引申，表述着一种和血缘无关的亲密认同。当你细细品味上面这几张绘画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作品，你会发现，画中孩子的游戏是有着某种意识形态功能的，不知不觉中，孩子们意识的深处就被植入了当时官方所提倡的价值观了。





上面几张描绘儿童游戏的画作，向我们直观地呈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儿童都玩过些什么？看到画面里的这些游戏内容，你会觉得是他们快乐呢？还是现在这一代孩子快乐呢？





### 进化耶？退化耶？



从和小伙伴一起玩儿，到独自与机器玩儿，儿童的游戏在岁月中变迁着。

从前孩子通常是与小伙伴们进行各种游戏的。那时，小孩儿们通过与伙伴一起游戏，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与伙伴交往，并尝试建立其最初的社会性关系；

当下，我们周围的孩子则已大为不同。他们更喜欢独自和机器相伴相处，他们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和各种机器的“亲密”互动，达到参与外部世界乃至与世界互动的目的。

裸露尺度之演进，以及文化的自律



这样的自小就在种种智能机“朝夕相处”的“陪伴下”长大的一代，“机器亲属”会不会造就出未来的他们和我们大异其趣的情感及世界观？原本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与人际关系，会不会渐渐地被宁愿与这类“机器伙伴”耳鬓厮磨的新型情感关系取而代之呢？

上世纪广为流行的一些绘画中，常有儿童裸露身体的场景，就如各位上面所见，尺度都还蛮大的。以我们的眼光看，那画中所绘内容在而今的时代无疑很可能是会被指责为“有伤大雅”。但如我们所知，在这些作品发行的年代，人们大多都并不以为怪。这些画作能在当年顺利出版且大量发行，即是有力的证据。文化风俗，以及对其管理的尺度或许真的在逐年收紧？这也向我们提示，与多数人刻板的想象相反，眼下时代的观念比过往的年代似乎要远趋保守得多。“观看文化”经过这些年的演进，非但没有更为开放，反远比当初发行上面这些年画的年代要更加虚伪，或曰，更加的“纯洁”得多了……





不一样的偶像，一样的“偶像崇拜”

审视这些老美术作品的好处之一，是我们可以对过往的年代有更为直观的认知。通过对画作内容的研究，我们得以了解到那个年代中，人们通常会在画中看到些什么？譬如，英雄和劳动模范就是那时张贴美术一个非常热门的题材，这类画成为那时教化群众的主要视觉材料。如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里面既有战斗英雄内容的，也不乏影响广泛的劳动模范的。那时的孩子很多都是通过一张张印制精美的张贴艺术品得以了解英雄以及劳模的事迹，而画里英雄也多就此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一方面这是由于官方号召之故，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现实中的精英的缺位由此可以获得某种替代性填补，特别是在社会遭到“去精英化”的1949年之后。

在恍如隔世的21世纪，文化变得日益多元，风行一时席卷海内的张贴美术，在多元的

文化中，渐渐失去了往昔的优势，淡出人们的生活。回望“政治挂帅”年代的宣传美术，作为曾经名重一时的重要宣传媒介，张贴画在盛极一时之后，随着其时代政治气候的改变、转型，决定性地失去了其功能性优势，和它所宣传学习的榜样——那时被广泛膜拜的“英模”一起，在迅猛而来的市场文化中，被消费年代的各种喧嚣所覆盖。

以纸张为媒介的“英模文化”在经济和社会的演进中，理所当然地被以屏幕为主要介质的“明星文化”所取代。各路“明星”成为了今天这一代孩子膜拜的对象。形形色色的“星”已全面替换了往日之“英模”。当此时，我们再回顾这些昔日老年画时，可以明显感到画中所推崇的价值与时下之现实仿佛针锋相对的态势。两个时代各自崇拜着不同偶像，正反映出其各自价值取向的大相径庭。

“英模”与“明星”作为符号的象征，他们分别标记和定义了这前后两段截然迥异的岁月。但是，设若我们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去理解，则是否又会有另一番不同的认识呢？

作为时代精神符号的“英模”与“明星”，虽有其各自象征的不同价值谱系，但在满足不同时代人们对“偶像崇拜”需求这一点上，无形中，他们却又都是殊途同归的，他们承载着相似的符号能指，异曲同工。

在潮流激荡和风尚的更迭中，无论是昨日画纸上的“英模”，还是当今荧屏中的“红星”，“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只须分明去看，皆不过是“膜拜文化”的不同“变身”而已。在令人眼花缭乱之余，“异形同构”的共同心理和文化姿态，若隐若现……■

【争鸣】

## 文革研究向何处去？

小鹰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50年了，还在争论不休。

最近，读到华新民先生2006年写的《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这给了我一个基础来思考：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这篇评述虽然是十年前写的，但文革研究的状况和思路，至今恐怕变化不大，所以我就先由此谈起。

从华文的介绍来看，“中国官方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说法，“就是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反修防修’”，这也是“在国内的文革研究文献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见。而他所介绍的多数非官方学者均放弃了这一途径，转而集中在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上去研究。他们得出了如下一些结论：

- ◆ “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 ◆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
- ◆ 毛泽东“既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权旁落的恐惧感。”

华文最后综述道：“试图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党内同事们的分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毛泽东的心理状态，追寻毛泽东言论背后的隐秘动机。笔者认为这是具有历史观的正确思路。”

这种思路到底是一条大路，还是一条走不远的小道？

看来，由“心理分析”来追寻毛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这种转向似乎是想绕过一个难以超越的“障碍”，那就是官方宣称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从来是无可指责的。”

“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那么，如果再按“毛泽东自己的说辞”去谈“两条路线的斗争”，文章就有点做不下去了。因为一提到刘少奇是“走资派”，他在“义正词严”的毛泽东面前，似乎就“理亏三分，矮了一截”。毛要打倒“走资派”，谁又能说个“不”字呢？因而一些学者干脆否认建国后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否认“刘少奇是‘走资派’”，认为“毛刘同是‘一丘之貉’”，文革是“狗咬狗，一嘴毛”，从而就方便地搁置了毛自己关于“反修防修”的说法，不至于“坠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高文谦）。

可是，这样消极地回避文革是要“打倒‘走资派’”的这一明显的宗旨，便放弃了一个论辩的主战场，即毛刘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

今天看来，我同意华文中所肯定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但是，我不以为由此就只能从政治家的“阴暗心理”和“低劣人品”上去寻找其“隐秘动机”，也不期待通过“考据和索隐”去发见最新“密笈”，去解读“只言片语”，甚至从“传闻”、“八卦”与“宫闱私房话”里，企望“独具慧眼”地发掘出“惊世骇俗”的历史“大原因”、“大秘密”！

当然，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简单化”，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但这决不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把一场严酷的“路线斗争”降低为“个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主要线索，不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和体制的深度，来分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来判断两条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那就不能防止毛派路线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否则，难道人们日后只要精心甄选“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领袖，中国就可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文革那样邪恶的“政治运动”了吗？

后来，有些学者重新开始接受毛泽东的说法，但又无法否认文革失败的事实，就索性



归结为“试错”说——毛是“好心”尝试，但没有能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既然“动机纯正”，而“试错”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所不可避免的过程，那毛“试”而不成，也就没什么可多被指责的地方了。甚至，他还成了一个“敢于‘吃蜘蛛’的勇士”！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思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杨继绳先生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

应当肯定，杨文正确地批驳了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说他们把文革看作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恐“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杨指出这种“争权”的说法，过于简单，“经不起分析”。

杨文也正确地看到了毛刘之间的政治分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但是，在这个分歧面前，杨仍然没有能够超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这个“障碍”。杨仍然肯定“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只不过毛是“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结果，结论还是毛的“主观意愿”是好的，“文革的宗旨”是对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

正是拘泥于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善’”的假设，杨不但不能认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合理性，反而迎合毛泽东的煽情说法，给刘戴上了一项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由此杨把文革曲解为由毛“怀着深深的忧虑”而发动的一场“反官僚”运动（即由所谓“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所引起）；同时杨又认为，因“极权体制”所限，文革也是由毛一手操纵的一场官场“权力平衡”的游戏（即由所谓的“第二重紧张关系”



——“官官矛盾”所引起)。结果，在今日一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反倒成了一位因反官僚、反贪腐而“失败的英雄”。一些论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读为“百姓恨左不恨毛，官员厌毛不厭左”（秦晖），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厌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

“勇士”也好，“英雄”也好，是非黑白能被如此的扭曲颠倒，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包含在那一个“善”字的前提之中了。

与上述的“心理”说、“阴谋”说、“争权”说、“试错”说，以及“官僚”说等思路相反，在我看来，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例如，由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十六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在这一点上，我接受毛泽东自己关于“文革宗旨”的说法，而且，刘少奇也不是什么“官僚”，他就是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但是，我要问的是：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动机，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吗？他那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豪言壮语”，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吗？党内真的就没有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吗？如果有，那到底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和需要，还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伟大、光荣、正确”？如果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会怎样看待“毛刘之争”？到底是“刘修”还是“毛修”？

我的看法是，文革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建国后 17 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

自 1949 年以来，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

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也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如果把这场毛刘两条路线斗争的“官司”打到共产党祖宗马克思那里去，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毛泽东在中国道路问题上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反走资派”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伪革命；极“左”的毛泽东和守旧的慈禧太后“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因此，这里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政治家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当然，我们这里不妨也反问杨继绳先生一句，难道“走资派”刘少奇的出发点就是“恶”的吗？他在文革中被打倒，是因为“官民矛盾”还是“官官矛盾”？

可是，文革之后，不但刘少奇，连马克思也变得很臭，人们以为毛泽东搞的那些都是出自马克思的教唆，让他和毛一起挨骂，那倒是中了毛毒太深了。文革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左”字了得，我们现在应当警惕，要实事求是地看人、看问题，免得重蹈复辙。我主张在文革研究中，把刘少奇和毛泽东区分开来，把马克思和毛泽东也切割开来，目的是为了彻底孤立和剖析毛泽东。

先生们，我这样做，是想在研究思路有所突破。我根据史实和文献，以上述方式把刘少奇和马克思作为正因子项引入“文革方程式”，再加上历史的“初始条件”和地域的“边界条件”，看能解出来什么？希望这解不但能在统计上符合以往的数据，同时也能为以后的运动轨迹提供些指示。此外，讨论社会问题，和讨论物理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包括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言论自由”等等。否则，将形同“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却不得要领。当然，这些概念本身应当与时俱进，也绝对是可以争议的，但其内容的深度又决不是一个轻松“点评”就可以打发得了的。

现在许多人一看到我提“马克思”三字，就“嗤之以鼻”，掩卷不看。其实，我还不至于如他们以为的那样“迂腐和堕落”。只是许多人不了解，“人云亦云”地跟风，而不做独立思考，粗粗一望，便以为毛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却不知马克思是封建落后国家“走资派”的鼻祖，是毛泽东的死敌，也是我们今日彻底颠覆毛派“理论”的利器。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总而言之，“破除障碍、抓住矛盾、搞清概念、辨明是非”，这是我对今日“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一个想法。■

写于2016年4月

## 【争鸣】

### 关于“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sup>1</sup>

小鹰

####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佯谬与辨析

4月11日张明照先生来邮质疑：

你一直在马克思的旗下批毛，可是放眼世界，没有毛的社会主义又有哪家成功的？把取缔私有制作为目标，根本上违反了人性，违反了基因的力量，这是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不是理论问题，实践已经给出结论。人性可以走向文明，但无法“无私”。（除了少数极虔诚的教徒）

4月11日小鹰答辩：

<sup>1</sup> 文中的来信质疑者之姓名，均为化名——本刊注。

你说得不错，但看来你混淆了苹果和桔子，思维有点跳跃。

我不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社会”要做些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也不认同马克思。况且，1949年的中国也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革命。我这里问的是：像那时中国这样落后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该怎样做？对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代替“封建主的社会”必然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还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他这里并没有讲要废除私有制的问题，而是要破除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

换句话说，认为手推磨就能产生“无产阶级”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那是毛泽东发明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理论”，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国家，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否定表达式。

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毛泽东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所以，我认为要把马克思和毛泽东从这里切割开来。

与毛泽东相反，建国初期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他看出毛要搞的“集体化”在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当时就敢有文字批示反对“合作化”；在1951年他更主张工商业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刘少奇很有眼光，也很有勇气。无论你怎么不喜欢刘，仅从这一点来看，他是对的，他读懂了马克思，并且日后一再坚持当“走资派”，实属不易！这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重要区别所在，也是毛最终要打倒他的原因。

但1949年建国以来，苏联“社会主义”一度成功的假象也曾误导了国人，让刘派“实

事求是”的主张在毛面前始终低声下气，“理亏三分”；其时党内宁“左”勿右，业已“蔚然成风”。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凡群众运动中的“理智派”从来没人听，“狂热派”则永远占上风。刘少奇当年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今日的精英多以“义人”自居，处处贬斥刘少奇，然而，即使令他们自己回到建国初期，恐怕是远想不到、也做不出刘的所作所为。凭心而论，那时党内外没有几个人能在苏联的“成功实践”面前讲出什么话来，除非真正了解苏联的真相，真正了解马克思痛斥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深意。这就是道路选择之困扰，中国遭毛这一“劫”之必然。而今天当政的和在野的，又有多少人读懂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和“要做什么”？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所说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凶恶实质？并在这个意义上，来肯定“走资派”的主张？来支持“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诉求？来理解“自由、平等、博爱”之重要？来阐明“民主、人权、法制”之必须？

现在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先生在内，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粗粗一望，便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合理的部分也加以否定，更看不出刘少奇路线之正确。这样做，恰恰是掩盖了毛泽东致命反动的地方，没有打到他的要害之处，因而也不知道以后应当怎样做。他们的思想深度不但远不如刘少奇，甚至似乎至今还没有能走出文革，还在继续完成毛要“彻底铲除‘走资派’刘少奇”的未竟大业，真可谓是“糊涂之极”！

至于你问道：“可是放眼世界，没有毛的社会主义又有哪家成功的？”

我们上面所谈到的“社会发展规律”应当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我在《论文革的反动性质》中那六道思考题里也有如下一问：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必要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请注意，他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政治制度”所用的三个定语都是明确限定在“现代的资产阶级”之下！）1949年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这是否是他们“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

遭到惨败的共同根源？

马克思 1848 年痛斥力主批判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讽刺说，你们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倒德国时，却没有能同时把“法国的生活条件”也搬过去。他为什么那么看重当时德国所没有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上述那些落后地区搞“社会主义”时，又有哪个国家先有了“法国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说“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这听起来，好像马克思也是在教训毛泽东。注意，他这里所用的定语又都是“资产阶级的”。要是封建专制的中国能有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被“激进党人”诅咒的东西，那就好了。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自由主义”，没有“代议制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是不是？然而，自毛泽东掌权以来到文革失败为止，他一直竭力要破除和防止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却正是马克思期望当时的德国，以及所有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首先去争取具备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所以，我要问你，你看出这里的区别吗？你真的认识你所谈论的那个马克思吗？

1945 年党内外有个“新民主主义”共识：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如果真让刘少奇按“新民主主义”所说那样做，那起码是个起步。从 1951 年起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那到了 1961 或 1971 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被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亚洲四小龙”更早。若是刘不行，以后也不是没有像胡耀邦等那样开明的领袖。这就是“道路”之不同。

所以我说，建国以来是有毛、刘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刘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

际状况的“进步”，毛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以上是我的一些基本点，不知是否回答了你的质疑？不错，我们“人微言轻”，但只要能“言之有理”就好。我们能有针对性地谈问题，很好。欢迎进一步批评讨论。

## 二、有关“心理”说和“路线”说的讨论

4月13日孙大力先生来邮讨论

小鹰：

我很同意你对毛泽东路线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或许更适合解释他发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的举动，却不能完全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经过大饥荒和后来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刘少奇等人已经纠正了毛的路线，相信毛也知道自己路线走不通，他在1965年跟彭德怀谈话说历史也许证明你是对的（大意）。换句话说，“试错”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还要不认账，反而变本加厉发动文革，就不能不让人们追问他的个人品质和权力欲了，这是很符合逻辑的，并没有刻意庸俗化。

所以，我觉得，对于毛泽东的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治国路线的分析和批判是值得继续深入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面对自己路线的失败后采取的态度同样值得深入挖掘其根源的。正如有不少人指出，毛泽东对于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还有一定的雅量，但是对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对了的人则不能容忍，必曰置之死地，这就涉及到毛的心理、品质和权力欲了，也是一种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解释。我觉得两方面的分析不必分孰高孰低。

4月14日小鹰回邮

孙大力先生：

谢谢你的回馈。我一直在等你的意见，它对我非常重要。

由“心理分析”来追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如你所说，是正常而无可非难的研究途径。我也认为：“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

但是，我为什么又要问：“这种思路到底是一条大路，还是一条走不远的小道”呢？

请允我解释。

如我上次邮件里谈到最近《炎黄春秋》上王蒙先生的那篇反思，它除了对毛的性格描述和现象叙述之外，并没有谈出个文革发生的“所以然”，属于很一般化的“控诉”。它基本上还是官方的“反修防修”、“毛与百姓同在”的说法，不过加上了一些对毛的“荒唐事”，及其心理、品质、作风上的调侃。而这类对毛个人的讽刺、揭底的文革反思，目前在国内或许还能够为当局所容忍，因为毕竟这只是毛后期个人的事，共产党还是“伟光正”的嘛！而毛乱搞女人，现在已为众所週知，如果再加上政治上阴险狠毒的行为，即使以“心理阴暗”和“人品低劣”来描述，可能会把毛进一步搞臭，但很难说在政治上有多大的力量。“毛粉”仍可以用“风流亦伟人，无毒不丈夫”一句话来自慰，即“大人物要看大节”，“阶级斗争嘛，就是要不择手段”！所以还是打不倒他。

但是，如果我们把“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去，揭穿毛是如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沿这条路走下去，这就可能要颠覆整个毛派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了。结果是让人们知道，原来毛只有“秦始皇”，没有“马克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恐怕会令当局更加恼火和恐惧，也会让“毛粉”冷静下来想一想。所以，把马克思同毛泽东切割开来，也许更有意义些。当然，“心理”说与“路线”说，二者并不对立，也不分孰高孰低，它们是互补的关系。

此外，如果只是因回避“官方障碍”转而由“心理分析”来揭批毛，那比刻意否定有“路线斗争”，要好很多；更比接受“官方的说辞”，但又搞“试错”说或“官僚”说，把毛开脱为“勇士”、“英雄”，要有意义得多。所以我批评的重点是后者，不是前者。



第二，你谈到：“不过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或许更适合解释他发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的举动，却不能完全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

对此，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建国以来，刘派和毛，在许多重大的具体问题上，如对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等，经常是“面和心不和”地明争暗斗。文革前，毛遭遇的所有失败恐怕并没有使他认为“自己的路线走不通”，相反，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这“分歧”根本就是个“道路问题”。因此，他是“为了彻底解决中国‘走资派’的问题”，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来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个战略性的行动，不是一个如“庐山会议”那样的战役。尽管刘少奇那次表面上是站到了毛的一边，但内心里他还是反对毛的“左”的方针。因此在战略上，毛是把刘看作自己的死敌。所以我说“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而不只是个“修复面子的工程”。

至于说到“毛泽东对于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还有一定的雅量，但是对那些反对他而证明反对对了的人则不能容忍，必曰置之死地，这就涉及到毛的心理、品质和权力欲了。”那人们会问，在拿掉了刘派之后，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这就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报复“政敌”、挽回“面子”的心理来解释了。

事实上，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要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等由他“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而另一方面，刘少奇等也不是些等闲之辈，刘有着自己的“走资派”理念和建国蓝图，麾下也有一帮强悍的人马，包括党内外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双方的较量最终是要走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如果我们把他们之间的斗争低看为“妇姑勃谿”，或是些市井小人、婆媳争斗，那只是把我们自己降低到这一水准去了。

从另一方面，我又可以反问，如果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整治那些使他“恨、羞、怒”的同僚，只是他的阴暗心理因素在作怪，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又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长期以来毛收拾这些人，不是“得心应手”、“踌躇满志”，一贯是以胜利者自居的吗？

而实际上，文革中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这些人又怎么使他“心理不平衡”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因此，毛不但要清除他的“走资派”政敌，还要彻底扫荡他们借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以实现他的“大同世界”。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毛的这种理念，完全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是一种极其凶恶和反动的主义。——顺便提一下，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你看，这样来解释，是否更合理些？

最后，我不是说，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心理因素的支配，相反，对毛的远近“心理分析”尤其有必要。但是，如果“心理”说把眼光只集中在“宫廷”内个人的角斗上，却忽略了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上“两条道路”大尺度的博弈背景，就容易钻进“牛角尖”去。所以，我说，纯“心理分析”这条道，可走，但走不了多远。

关于“庸俗化”的问题，不是指华文评论中的那些严肃的学者，他们的分析还都是有根据和有说服力的。但近来确有一类“大嘴”热衷于以此来吸引眼球，甚至编造些文革内幕故事，以求“耸人听闻”。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最新发现”——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1966年8月关于刘少奇欲发动“军事政变”的报导，说是“毛为此被刘逼的‘走投无路’，才搞了文革”。这就是我说的那类“最新‘密笈’”。因“出土”于国外，又编得“有鼻

子有眼”，读来“惊心动魄”，为人转发个不停。

总之，我会听取你的意见再作些改动，并注意提法，改好后再告诉你。我喜欢这样有深度的、一对一的交流。让我们常有讨论，谢谢！

### 三、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

近来在和友人电话交谈中，常听到对本文的一种质疑，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所以，你文中关于‘反封建’一说，没有根据。”

因为不止一人有这类质疑，我就想一起对此答辩如下。

对于中国社会属性的判断，是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如果认不清楚中国社会的属性，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应当怎样改革？近年来，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的说法，好像易中天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些名士的“颠覆性”新论是否可信呢？

我所看到对之的论述只是一句话：因为周朝“分封诸侯”，秦始皇“一统天下”，所以自秦以来，“封建制”在中国已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这样简单地来作社会性质划分，近乎是对“封建”二字的“望文生义”或“咬文嚼字”，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而，是个极大的误导。

我以为，判断一个社会的属性，主要是要看它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注意，这里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这里所说的“生产力”也不是仅指GDP的数值，而是主要指其主要因素——人，被“解放”到了什么地步？此外，也要看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进步”到了什么状况。而“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来决定的。

如果这样来看，自周朝的“分封诸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及后来的历朝历代，

政治体系、制度法令等虽各有不同，但“生产力”的水平大致相同，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手工操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状况，“生产关系”则定格在土地私有和租佃交易之上。

而千百年来，与之相应的礼教制度、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也是“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不错，多少年来，我们总有个“皇帝坐龙庭”，要搞中央集权，但国家太大，关系复杂，交通不便，因而“皇亲国戚”、“封疆大吏”、“铁帽子王”还是不少，满清王朝也有个“八旗”，更不用说地方上有数不清的“土豪”占山为王、“恶霸”乡镇邻里。大家族各有“家规”，土皇帝亦有自己的“王法”。老蒋时“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到了老毛，他也怵八大军区司令在一个地方久待坐大，要予以对调架空。

当然，从周的“诸侯自治”到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是国家体制上的一个重要改变，但“封建割据”也好，“皇帝独裁”也好，“专制”二字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地方专制”或“中央专制”之不同罢了。这正如巴金所说：在我国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老化》，载《随想录》。）

那我们又有些什么样的“传统”或“特色”呢？鲁迅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几千年来，无论是国家省市还是家族家庭里，一级一级地都是照此章（专制等级）办理。这种“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是由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所确定，这种封建意识也深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

应当看到，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自民国以来，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开始有所转变，但生产力的水平仍然十分落后。到了毛泽东的时代，随着毛式“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人为的、强制性的扭曲。对此，王若水先生有过这样一个论述：

关于主要矛盾，八大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提法表明中共意识到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不相称。也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程度时就提前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与其说中国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不如说中共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行动是超前的、左的。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并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是提高落后的生产力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重建合理的生产关系。

说它超前也好，扭曲也好，随着毛政体的专制独裁化，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不但没有被解放得自由，相反，倒退到更加受奴役的状况。实践证明，毛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大大地破坏了原本已经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

此外，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清廉的政府和光明安定的社会，相反，引发全国上下“专制和特权”盛行。文革的一个“丰功伟绩”便是把几千年淀积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道德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可以说是“封建主义”在我国大大地复辟了。

今天，尽管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还常常可以见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阿Q正传》中的人物和现象吗？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贪污腐败、贿赂奉承，奴隶心态、麻木不仁，“假洋鬼子”、“不准革命”，到自私、保守、涣散、愚昧，缺乏公众道德观念、少有社会整体意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又怎么可以轻言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不过，可怕的是，今天这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恢复民族历史传统”的口号下出现，它更能迷惑和麻痹人。现在一些人热衷于或拘泥于封建道德观念在

字面上的解释，甚至赋予它们摩登的意义，对之“顶礼膜拜”，但是鲁迅却能从“仁义道德”之后看出“吃人”二字，看出旧礼教的实质，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讲得不错，“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解放被“封建主义”桎梏的“生产力”之核心价值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专制”的国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因此，“走资派”刘少奇是对的，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中国要搞的是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如果只是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预言。

我们今天重提“回归新民主主义”，重申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其意义就在于此。

#### 四、关于“档案解禁”及“维权”说的讨论

4月11日至5月2日张明照先生来邮：

小鹰：

文章拜读，我同意你的思路，但我觉得毛是个十分复杂和阴险的历史人物，文革后40年国内上层对研究文革问题既打压又封锁，对内部档案至今都不解禁，而且几十年的愚民教育使60岁以下的中国人对文革、反右、镇反……等几乎一无所知，所以要深入研究文革和毛这个人都是十分困难的，而对毛的文革动机以及所作所为从简单的几个方面很难分析

透彻（条件不充分：上层不解禁、档案不解禁、媒体姓党、独裁依旧、奴化教育持续……），这也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举毛旗再度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知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

至于我看毛为什么发动文革？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其他什么反修防修都是骗人忽悠人的鬼话！

所谈看法仅供参考。

4月11日至5月4日小鹰回邮：

张明照先生：

谢谢你的讨论。

的确，档案没有解禁是个不利因素，我们现在只能做些解析和判断。好在我们还是经历过文革，有自己的感受，并掌握许多基本的资料和文献，高层双方当事人也有相当多的回忆，但即使如此，因立场观点、思路和方法不同，结论也大不一样。我只是想在思路有所突破，把刘少奇和马克思这样地引入“文革方程式”，看能解出来什么？

其实，“档案不解禁”并不是多大问题。现有的资料已经很丰富，毛的“言”已很多，“行”也已为天下尽知。主要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这些资料的问题。现在一些浅薄的学者对“社教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以及“炮打司令部”等重要文献已无兴趣，老指望发见“最新‘密笈’”来发掘毛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要知道，林彪跑了之后，毛翻出一封给江青的“打鬼借助钟馗”的旧信，并支撑不住他“四个伟大”的形像，也改变不了他文革失败的大局。将来就算是找出一篇毛的自述：《我为什么要搞文革？》，那也得与事实对照，要观其行。所以，我以为不必要等所有材料大白天下之后，再来“透彻分析”，而现在的“条件不充分”，正是我们要做反思的原因。如果说“绝大多数年轻人不知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难道我们自己现在就都明白了吗？

不错，毛把刘派搞掉，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搞

掉”背后的原因还是二人政治路线、治国理念的对立，且这“对立”的程度已是“不共戴天”了，才要“大动干戈”。总之，“专权”的目的还是为了“役政”。

当然，历史上不是没有单纯为地位、为性命、为财富、为女人的“宫廷格斗”，但现有的历史事实支持毛刘“路线斗争”的说法。问题是，毛的“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的“走资派”路线对？我的看法是：毛式“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刘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毛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欢迎再谈。

5月16日小鹰致周齐平先生的邮件：

周齐平先生：

我们昨天的电话讨论很好，对我颇有启发。夜间我又想了一下我们谈的几个问题，想同你再交流。

你强调的“争权”说，与我在[附录二]中提到的“心理”说一样，也面临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如果说毛发动文革只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的权力，那在刘被整死之后，刘派官员已“溃不成军”，毛在全国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极点，无人可以再威胁挑战他了，毛为什么还要说：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呢？他自己还有几年可活？为什么要关心身后每七、八年的事？我想，这正说明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发动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以后施“社会主义”之政道路上的障碍——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所以，“清君侧”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

的确，如你所说，苏联大清洗时期，从声望已威胁到斯大林地位的基洛夫被刺事件开始，在斯大林与后来被他一一搞掉的政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科夫、拉狄克、李可夫到布哈林、托洛茨基之间，我们似乎看不到有明显的政见不同。斯大林干的更像是纯权力之争。但毛刘之间在政治道路问题上确有不同。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杨继绳先生对毛刘之间政治分歧的概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



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可以说，这个分歧随后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毛刘两派公开或暗中较劲，此起彼伏，直到文革爆发。当然，文革中毛与林彪的斗争，更像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但毛与刘派之间则始终存在有严重的政治分歧。

不过，我们一定要以中国文化的方式来理解毛刘的分歧。

中国人要“面子”，“凡百事週全，一床锦被遮盖则个”，让百姓看不清楚，总以为“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中国人城府又极深。我们不可要求，也无法想象毛、刘二人平日总是怒目相视、见面就掐，一开会就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难道只有这样，才算是“有差别”吗？才算是“路线斗争”吗？……政治上的事情哪里会有这么简单！

最近魏京生先生还以为，中央委员会(应为政治局——小鹰注)全票通过“516通知”，就说明文革是中共自己一齐搞的，党内没有毛刘的路线斗争。这也太幼稚了，他怎么解释“二月提纲”？要知道，中共政治局不是美国的国会！两者运作的方式完全不同。

而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也很多。除了“针锋相对”之外，还有“虚与委蛇”、消极对抗。例如，我们以前只知道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公开支持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却不知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陈坡，《文革沉思录》之八)，他不但在会上机智地保护了“见义勇为”的李锐，后来更主张要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文革中的林彪不批文件、不表态，只划个圆圈便退回；周恩来则“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邓小平发誓“永不翻案”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对抗。而中下层干部和百姓们更聪明，对上面来的那些荒唐指令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灵活处理”或“阳

奉阴违”。即便“迫不得已”要作检讨的话，也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见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报告上的批示语）。所有这些抗争手段就不是现代那些“一根儿筋”的书呆子们所能明白得了的。这才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方式！

你看，这样来认识中国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是否更合理？更全面？

## 五、有关“官民矛盾”说的质疑

现在很多人谈到文革起因时，都笼统地以“官民矛盾”为基础。

但是我要问的是：

第一、那时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60年代台湾当局几度认为大陆遍布干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只要派人点火，民众必然“揭竿而起”，一举推翻共产党。但这并未发生。

如果说“官民矛盾”是文革的主要起因，而文教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那里的“官民矛盾”应当是很突出了。但我们那时都在大学，对那里的“官民矛盾”又有多少亲身感受？高教部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又怎样是个“官僚”了？那会儿清华的党干师生不都是很拥戴这位蒋校长吗？

第二、那时不是没有“官民矛盾”，但百姓的怨言和怒气，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还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毛的说法耶。

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那时就反了贪腐和特权。

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革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治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

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2016年5月整理

【述 往】

## 红色少年的快乐岁月

——缅怀 1950 年代的北京育才学校

刘 明

离开育才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已经从当年的少年进入古稀之年，老师们则成为了耄耋老人。退休以后空闲时，总觉得应当为育才写点什么，为青少年知古鉴今，了解那个独一无二的 1950 年代，略尽绵薄之力。现在借育才小学毕业育才学校入学六十周年之机，了此宿愿。

### 一. 题解

1950 年代，能够进入育才读书的，都是在京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儿女，可以说是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对于以育才（还有八一、十一、一〇一、育英、景山，等等）为代表的衣食无忧的红色少年，我把这个群体 60 多年来的精神生活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9，为快乐时期；第二阶段，1959—1966，为噩梦时期；第三阶段，1966—1976，为磨难时期；第四阶段，1976—1989，为新生时期；第五阶段，1989—，为裂解时期。我们这一届同学在育才生活的年代，恰恰就在整个 1950 年代，我们确实也享受了快乐的少年生活，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的气质性格，为人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在育才的少年时代是我们所独有的，再也无法复制，因此更彰显它的历史意义。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题目。

五十年前的往事已经消退在朦胧之中，回忆只能是片断的零散的。我的七年跨越了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许多往事究竟发生在哪个时段，难免会有偏差。

## 二. 背景

如果把育才同学的大多数作为主流，那么我却是主流之外的一个异数。

我是1950年开始成为“北京人”的。1950—1968，7+6+6=19年，正好走完了我的求学生涯。1968年，被分配，也可以说是发配到黑龙江，开始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段人生。

1949年，应中央劳动部第一副部长，民建副主席、著名民主人士，亦是中共最早的创建党员之一（之后脱党）施复亮的邀请，我父亲从当时任教的湖南武岗县洞庭中学北上北京，到劳动部任职。1950年春，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也从武岗到了北京，定居在德内大街弘善胡同。本着就近入学的原则，我到住家附近的德胜小学插班读一年级。

1952年，劳动部分到几个名额，可以送子女到位于先农坛的育才小学住校学习。有这样的机会进入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应当说是当年的北京人梦寐以求的。此时位于延年胡同的劳动部，一共也没有多少职工，部局级干部更是屈指可数，安排他们的子弟到育才所分配的班级上学过后，还没有用完全部名额，因此我父亲这个处级干部检了个漏，我就在1952年秋季进入育才，插入三年四班，有了与育才的七年因缘。

我说我是育才的异数，首先是育才同学的父辈绝大多数是司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少数还是部级，个别甚至是国家级干部，而我父亲只是处级，级别低。其次，大多数同学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而我的父母是党外人士。再次，50年代初，多数同学家庭是被纳入供给制的，这些同学在育才上学也享受的是不缴费的“供给”，而我家属于薪金制范畴，我上学要缴每月16元5角的生活费，其中11元是伙食费，余下的5元5角则包括服装费、卫生费、文具费等等。与我情况相同的同学有多少，我不知道，大约在总数的1/10左右吧？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又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简称“肃反”的运动。父亲因为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复杂经历，成为劳动部内肃反的对象之一，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最后的结论：历史反革命分子，但不以历史反革命论处。前面我说，对于育

才主体的同学而言，他们的噩梦始于1959年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后党内的一轮一轮运动和整肃。而对于像我这样统战对象家庭的孩子说来，噩梦从1955年就开始了。但也只是“噩梦”而已。

1956年，育才小学决定办初中，校名也改为育才学校。出于对育才的爱，我愿意留校升学，并且如愿以偿，没有任何障碍。

更大的灾难随后来。1957年5/6月间，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劳动部也开展了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人士提意见。父亲是个3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留洋经历，有民主自由理想，又缺少城府，心直口快。听过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又有马文瑞等部领导动员，他便在座谈会上率先发言，对批判胡风和肃反的作法，对领导作风等等，发表了一通意见。不久形势急转直下，从整风转为反右。新账加旧账，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便在此时的政治逻辑之中了。

中国政治大地震给我的家庭造成的打击，同学们恐怕都不知晓，老师们是否知道，我不清楚，学校总应该知道吧？作为初一学生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学校环境的变化。原因在于，周围的人对我一如既往，亲切而自然。1959年夏季初中毕业，因为成绩好，我获得了银质奖章并被保送进入著名的北京四中。育才对我确实是与其他背景的同学一视同仁。

当时因为小，更因为绝对没有“比爹”的风气，所以少年的我没有一点身份的自悲。至于同学的身世，大家似乎都不大关心。我仅仅知道很少几个同学的背景，例如，杨安咪、李妮娜是孤儿；张郁文是梁启超的外孙，父亲是中苏友谊医院副院长；续大田的父亲是著名抗日将领续范亭；刘克府的生身父亲是朱良才将军……。

回顾52年9月—59年7月的七年，育才，无论是同学，还是老师和学校，对我只有关爱没有歧视，哺育我身心健康成长。尤其重要的是，少年时代的经历，让我有对自己品格/能力的基本估价。五十多年来，我经历了或大或小的许多挫折，但我从未被压倒。育才为我奠定的这一切，我是始终铭记在心的。

### 三、学习

当年的教室是在操场南面的两排四幢平房里，每个班大约在四十人上下。教室南北两面都有门有窗户，光线很好，进出很方便。与其他学校的教室一样，没有暖气，冬天靠烧煤球带炉筒的铁炉子取暖，效果很差，教室很冷，只好辅之以搓手、跺脚来抗寒。同学当中生冻疮的很多，宫建能每到冬天，两只手都红肿得又肥又大。但是，上体育课有很大的操场，上音乐课有象样的专用教室，这在当时的中小学则是不多见的。

课时安排是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晚上两节晚自习，每节45分钟。语文、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这样的主课每天都有作业，其他课，例如历史、地理、政治、自然等课，作业则不多，时有时无。利用晚自习，偶而再利用些周末时间，大家都能完成作业，无论学习是好是差。周末基本上是休闲娱乐，绝对没有让考试作业压得喘不过气的情况。

当年的学生都很自律，不要说考试作弊从未听说，就连作业也很少抄袭，期末成绩单基本上能反映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到大学阶段，已经出现了极个别的作弊现象。发展到今天，不要说学生，就连硕士博士教师教授，抄袭作弊成了家常便饭，某校某院没有舞弊行为，倒变成了另类。教育怎么搞成了这样？

无论考试还是作业，评定都是采取移植自苏联的五级分制。期中期末考试是有的，平时考试不是太多，那怕是小升初，也没有感到压力很大。小升初没有入学考试，以北京市统一的毕业考试成绩作为升学录取与否的依据。

52年秋才转入育才时，我的成绩不大好，主课大约是三分的水准。以后逐渐好了起来，四年级四分，五年级五分。这以后，直至大学、研究生阶段，考试成绩总是居于前列。这大概与入学时育才正在开展实验小学五年一贯制，而到五年级却又回到六年制有关吧？可以说，我的课本知识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至今我还是认为，低年级小学生成绩不好，完全不必着急，只要智力发育正常，父母老师耐心引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绩转好的。我

不足的方面是，可能与读书嫌少，想象力欠弱有关，中学时写作文，从教后写论文，总感到力不从心，下笔费劲，所以学术研究的论著不是等身，仅仅没足而已。

育才不乏很好的音体美老师。体育老师魏廷陞，音乐老师李清贤、张华，美术老师闵中元……，都是北京著名的优秀教师。这些课程的学习好坏，与个人天分关系太大了。可惜我先天不足，这几门都不擅长。运动技能不行，但经过努力，初中时还是达到了劳卫制标准的要求。识谱唱歌，素描绘画，也自觉能力不强。好在我并不懈怠，尽力而为，老师们大约也看到这点，从未讥讽挖苦过我，使我仍能保持对唱歌绘画书法的爱好。

育才还利用自己的优势，不时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到校给同学们做报告，以扩展大家的见识。55年或者56年邀请冯雪峰、吴运铎来校时，老师还安排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到校门口去迎接他们，这是一种儿童的荣耀，所以今天还有印象。

#### 四、生活

1950年代的育才，可以说是一个收容了一千多个孩子的超级大家庭。

当时是六天工作制。从周一到周六上午，各个年级的同学都饮食起居/学习娱乐在一起。每个人，不仅熟悉同班同学，而且认识外班同学，甚至还认识一些其他年级的同学。不仅熟悉任课老师，而且认识许多其他老师。每个同学都有许多伙伴，人际关系非常密切。这与高中/大学时期显然不同。

学校的食堂只有两类，一是学生食堂，一是教师食堂。（另设回民食堂）。每天到定时用餐，没有餐券，荤素搭配的副食每人一份，主食粥汤自取。有一个阶段饭后还有水果/鱼肝油供应。每个同学都能吃饱吃好，好像没有热量营养过剩的，瘦猴胖猪，均不见。

宿舍，有的是先农坛的宫殿，有的是新建造的砖瓦房。少则六七个人一间，多则十多个人一间，多数睡双人床，少数睡单人床。被褥是学校统一发放的。除了星期六晚，平日都是晚自习后准时关灯上床，早上按时起床，有生活老师查房督促。星期六下午，部分同



学回家了，晚上出现一些空床位，会有外宿舍同学串床过来吹牛。兴致好的时候，吹牛可能吹到后半夜，第二天起床很晚，早饭也就免了。

清洁卫生有生活老师管理。教室宿舍的卫生是分组轮流打扫，被褥每学期统一收集刷洗一次，自己的内外衣裤基本上是自己清洗。周末，学校经常组织全校大扫除。每个班都有分配的地块，负责清洁管理。不过当年可没有今天的环保意识，大扫除的主要内容就是拔草，地面上寸草皆无，越干净越好。

出行，星期六午饭后，同学们就可以回家了。52年秋我入学后的一段时间，周六下午校门口会停了大大小小几十辆各个中央国家机关的汽车，接本部门的子弟回家。那个时候，我也可以借光坐劳动部的汽车回家。但大概只过了几个月吧，校门口的这种公车就不大见到了。自此之后，公共电汽车便成为大家的主要交通工具。我是先步行十来分钟到前门南大街上的天桥百货公司门口，坐有轨电车大约四十分钟到西直门内的新街口，然后再步行十分钟，就到家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样又多了一个选择，有时会骑车穿小路回家。

育才的七年让我养成了许多终身的习惯。一是自己动手，讲求卫生。几十年来，无论是住集体宿舍还是在自己家里，扫地擦玻璃打水等等，一向是自助式的。内外衣物也都是自己清洗，不用母亲或妻子代劳。不请保姆，不靠他人。二是遵守作息时间。每天十点左右睡觉，六点左右起床，不开夜车，不睡懒觉。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均是如此。三是以车代步。直到今天，自行车仍然是我的主要交通工具。1990年代开始，许多人学车买车加入了有车一族，我却对中国发展私车一直持异议。55岁那年，我倒是买过一辆捷安特山地自行车，节假日与年轻人一起骑行去郊外游玩，别有一番乐趣。要不是因为偷车贼太多，我早就想买一辆高档跑车玩玩，既环保节能还自由健身。

## 五、老师

育才/四中/北师大，是我读书年代的主要学校。三所学校老师的共性是都很敬业，精力就用在教书育人上。以教谋私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行为。但要论教学风格则差异很大。如果说，北师大专业老师是凝重型的，四中老师是严肃型的，那么育才的老师则是慈爱型的。

因为先农坛，即育才校园很大，校址又位于宣武区北纬路，交通不大方便，所以老师们的多数就住在学校里，大体上是单身者一间，带家者两间，或者平房或者双层小楼。住校的我们不仅在课堂上与老师接触，课后还与老师及其家人接触，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谢士新老师是1955年到育才的，他是向往革命的泰国归侨。到育才后，就给我们讲历史，初中时还当过一年我们的班主任，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好象是一个年长的大哥庇护照顾着我们。他的普通话讲得很清楚，但有明显的广东腔。才来的两年，他单身住在四院平房最东边的小屋里。因为学习历史的兴趣，我多次去过他的宿舍，向他请教问题，借史书阅读。“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对五千年中国史的最简明概括，就是谢老师教的，管用了五十多年。

田俊九老师，是我们初二初三时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我眼中，她已经是年纪很大的老老师了，其实她也才四十岁上下。她一家四口住在三院南端的两间平房里。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分别叫田庄田园田大地，我们没有见过孩子们的父亲，好像这里有那个时代的故事。记忆犹新的是，语文课里有苏俄文学的内容，下课时我问她《苦难的历程》是哪个托尔斯泰写的。第二天，她写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列夫·托尔斯泰和阿·托尔斯泰的生卒年月和主要作品，由此我绝不会把两个著名的托尔斯泰搞混，并且对伟大的俄国文学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田老师和我们的母亲年纪相仿，她的关爱也的确与母亲类似。

在小学五六年级作我们班主任的是白继先老师。他刚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戴副眼镜，高高的个子，人很精干。他课教得很好，区里市里经常组织观摩教学，在大礼堂。即使观摩，我们也从没有事前演习，与平时上课完全一样，绝不会演戏。他同时也比较严厉，班上调皮的同学也怕他。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纪律不好，总有人说话，批评效果也不大。白老师生气了，把一个同学——好象是杨安咪——叫起来，命令他站好，但安咪就

不理睬，于是白老师用脚拍他的脚，让他双脚并拢，但他还是又再把脚叉开，两人“较量”了几个回合，“不分胜负”。白老师只好把安咪拉到办公室继续批评。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当年最严厉的管教方式了。

还有许多育才老师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舒慧贞是我们的几何老师，她在讲到直角三角形时，说我们很容易把直角三分之一，也就是画出三十度角。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用圆规直尺三等分任意角。舒老师的一番话，激起了我们战斗的激情。在一段时间里，我和张郎郎、张久兴三人，课上课下绞尽脑汁，要攻克三等分任意角这一难题，有时候甚至感到方法已经找到了，当然每次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用圆规直尺三等分任意角和作倍立方体，化圆为方，是数论学家已经证明了的，三大无解数学难题。

姚绍光老师好像是部队转业到育才的，他妻子是教体育的莫老师。和平方法则“首平方尾平方二倍首尾在中央”就是听姚老师讲的。音乐老师李清贤合唱指挥庄重又漂亮，当年他和张华老师教我们的莫扎特、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杜纳耶夫斯基等人的外国歌曲，张文纲、瞿希贤等人的儿童歌曲，确定了我们的审美取向，至今仍然百听不厌。地理老师李学通，留着一丝不苟的分头，字写得工整秀气，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拿粉笔信手画来，形状八九不离十。

对于年幼的我们，阶级斗争在育才有什么表现，不甚了了。但是，数学老师王清平突然消失，而且还有同学说，看见他是被人带走的，让我们多少有些怅惘。

## 六、同学

初中时代的育才，同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虽然多数同学是由育才小学升上来的，但外校来的同学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新来同学的情况多种多样，有些是家在天桥附近就近入学的。第二，女同学占的比例很大。小学时，我们50级一共六个班，其中一

班是男生班，二班是女生班，其余四个班是男女混合班，每个班的男生女生人数差不多。而初中五、六级共四个班，女生远远多于男生。我们初一二班有男生14人，女生28人。

初一二班里有几个同学也是我小学六年四班的同学，例如郭福和，潘昌贵，谷景莲，郭娜嘉，戴咏絮，张郁文等。多数是育才其他班过来的。也有来自外校的几个同学。因为继续住校，与别班同学也会因种种因缘交往较多。

张郎郎小学时和我一个班。小学毕业去了四中，但初三时又转回了育才，在一班。他有先天心脏病，时不时病休几天，但功课很好，尤其是文学天赋出众，会讲故事。常常在晚饭后他身边会聚起一群同学，开讲一部他刚刚看过的小说，例如《基度山恩仇记》，半月一月方能讲完。学校里组织诗歌朗诵，他朗诵马雅科夫斯基长诗《列宁》、《好》，博得师生共同喝彩。初中毕业后，郎郎又辗转多校读书并参与诗歌文学运动和社会活动，经历坎坷，大难不死。虽有重病在身，仍活跃至今，也算一个奇迹。

张久兴初中与我同班。成绩不太突出，但特别好强，从不服输，热衷于标新立异。我与同学们经常讨论数学题目，他总要独出心裁，搞出点新方法，并且说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久兴后来参军，见面时会谈论我军的装备如何先进，官兵斗志如何高昂，打仗将所向无敌，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军人。但在1966年前后，他却非正常死亡了，是育才同学中过世最早的一位。直至今日，我仍大惑不解。

潘昌贵与我同学六年，是我的好朋友。从小就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有六七百度，全校第一。他动手能力很强，手工课上，做木头手枪，做石膏人像，都技高一筹。但是学习书本知识的能力较差，与我正好构成互补关系。他的外祖父（三爷）是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因为家庭变故，初二离开了育才，回到太原老家，在邮政局一直工作到退休。50多年来，我俩始终互通音信，传递着同学们的消息。

刘士才是初一四班的同学，工人家庭出身，家就住天桥附近，这种情况在小学时期是没有的。他象棋下得极好，曾荣获北京市中学象棋冠军。我也喜欢下棋，多数棋友下不过我，但我几乎从未赢过他。记得57，58年有一段时间，刘士才带着刘克府、刘忠铁和我，

晚上到先农坛体育场去向象棋名宿谢小然学棋，时间虽短，但棋艺长进不少。刘士才的另一特长是讲述中国传统小说，什么《七侠五义》、《十三妹》，说得栩栩如生。当时许多本年级同学喜欢听他的说书。

## 七、游戏

当年我们玩过的游戏很多很多。一两个人就可以玩的，有拍洋画、滚铁环、耍拐、弹球（玻璃球）；几个人玩的，跳绳、跳格子、捉迷藏等等。团队游戏有：踢足球，打垒球，打手球。因为校园大，活动场地多，不要说下午课后，即便课间十来分钟，我们也可以到院子里玩耍一阵。如今我的外孙上小学，从早晨七点五十入校到下午三四点钟放学，除了课间操、体育课，学生都不准离开教室，更不要说下楼了。天生好动的小学生，却要在教室里一关就七八个小时，实在是违反人性，我为孩子们感到悲哀。但校方的理由是怕孩子们打打闹闹，碰了磕了伤了残了，负不起责任。真是无言以对，事情怎么变成这样？

另外还有一些游戏是与当年特定的时空紧密相关的，50多年的时空变迁，今天已经无法想像。

首先想到的是天桥。座落于大栅栏和北纬路之间的天桥，是清末民国时期北京民俗文化的集中展出之地。什么杂技、相声、摔跤、拉洋片、耍大刀、变戏法……，应有尽有。还有豆汁、粉皮、羊杂碎、炸酱面等小吃。全是在地摊或帐篷里作业。大概五分钱一毛钱就能参与一项活动。大家都是穷学生，谁手里也只有两三毛钱，最多也不超过一块，其收费正好适合我们。周末如果不回家，星期天天桥肯定是同学们的假日必游之地。赶场子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既体验了原汁原味的京味文化，也接触了社会大众。1950年代末，天桥被改造了，人去场空。再去天桥，心中不免泛起苍凉之感。

与空间相关的游戏，还必须提到先农坛体育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于1959年十年大庆时建成之前，先农坛体育场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比赛场地。国际足球赛，田径赛，都

只能在这里举行。而我们学校与体育场只有一墙之隔，逢比赛日，偶而学校通往体育场的旁门会开着，或者观众不够多，或者网开一面，我们可以方便的过去。如果旁门关着，我们就要从大门绕到体育场去。这样的地利，让我们能目睹一些重大的比赛。例如中国足球队与苏联足球队、匈牙利足球队、越南足球队的比赛，一些国际田径锦标赛。我们见识过当年的国脚，像张俊秀、张宏根、年维泗、陈成达、陈复賚、冼迪雄、王陆（班上一个足球迷叫做王宝昌，他拥有班上唯一的足球鞋，踢左边锋，我们送他一个外号，就叫王陆），我最佩服的是外号“拚命三郎”的八一队—国家队后卫姜杰祥。见识过郑凤荣、扎托佩克（捷克人，长跑世界冠军）这样的一流明星的精彩表演。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在场外一边听张芝等人的实况转播，一边体会场内的气氛，例如1957年中国队以4:3战胜印尼队，那场著名的世界杯外围赛。

喜爱观看体育比赛，成为我终身的嗜好，让我绝不会产生空闲无聊的感觉。从50年代到90年代，我看了四十年的中国足球，后来中国足球又臭又烂，一气之下，不看了。但是，CCTV5仍然是我打开电视机后的首选。诸如NBA，奥运会，世界田径大赛，足球世界杯、欧洲杯，CBA，象棋全国挑战赛……。2004年日本韩国联合举办世界杯，杭州《今日早报》举办竞猜活动，我获得了第二名并拿到多个小奖。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我买了包括田径、足球、篮球、垒球棒球等在内的二十多张票，论数量浙江省第一。

与时间相关的游戏，就需要回到1958年。当年毛泽东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要求“以钢为纲”，钢产量翻一番，从735万吨提高到1470万吨。要求“以粮为纲”，放高产卫星。一些科学家也出来作论证。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文，说他计算了光合作用，现在农作物所利用的光能还非常非常低，只要把利用率提高一些，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老师们也号召全体同学积极行动起来，投身这一伟大运动。作为十三四岁的学生，哪里知道政治的奥妙和凶险，只知道热闹好玩。于是，就有我们每人一“武器”为麻雀设下天罗地网的游戏，有千方百计研制农药波尔多液的游戏，有撅地三尺施肥万斤播种五百，力争小麦亩产十六万斤的游戏……

也是在58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以“百花齐放”为总标题，发表了他以大跃进速度写成的101首咏花诗，稍后还结集出版了诗歌集《百花齐放》，成为当年最热门的畅销书。这位以《天上的街市》出现在我们语文课本上，并让我们迷醉的五四诗人，在其最先发表的《水仙花》中写道：

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  
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头过活。  
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另外100首也是这一风格。《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还从春季开始，连续发表在全民诗歌运动中采集到的新民歌，前前后后大约有数千首之多（郭沫若、周扬编选了其中一部分，以《红旗歌谣》为名于1959年出版）。现在只记得其中一首的豪言壮语“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路，我来了！”有天天读报习惯的我当然会受这种气氛的感染，并且受到这种新诗形式的激励，认为诗歌写作无非如此，人皆可为之。加之班主任田老师热情号召同学们敢想敢做，踊跃行动，争当小诗人。各班在教室后墙开辟了诗歌专栏“发表”同学们的创作并相互比赛。我当时也是积极分子，大概写了几十上百首诗，当然都是低档的打油诗，今天一首都不记得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五十年前写诗的自不量力，白费功夫，让我至今不敢写诗。

悠悠岁月，50多年过去了，育才还在，同学们还在，大多数老师也还在，然而当年的育才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学习生活条件虽然很是一般，不过应当承认是高于普通老百姓的。但是当年的干部还是有理想的，自律的，育才的环境远远谈

不上浪费享乐奢华。我们在温室里接受的是红色文化，所看到的是棱镜里的世界，与真实相距甚远。

经济学上有“路径依赖”原理。无论是荣幸也好，还是遗憾也好，我们的人生轨迹深深地打上了育才的烙印。半个多世纪以来，规规矩矩作人，认认真真作事；不会低三下四，阿谀奉承；也不会颐指气使，仗势欺人；维系做人底线，保持人格尊严；是当年育才人的共性。但缺少城府，不会机变，不识时务，不结团伙，又难做大事，难成大器。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的回忆可以算是早年弟子给母校还债，也算是过来人对后来人有所交代。■

2013-12-8 初稿

2016-5-12 修定

## 【述 往】

#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七）

## ——内蒙保安沼农场

王丕忠

### 修旱坝

春节期间前后有五天休息，一则因任务告一段落，二则因适逢春节。我自投入劳改以来难得有这么多天的休息，长时期艰苦劳动，一下子休息多天，反而全身感到酸软，但很舒服。那几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临近沙漠地区，只要天晴无风，白天气温上升得很快。犯人们在大院中或缝补衣服，或下棋看书，或集拢谈天，一片平静安逸景象，以往可悲可怖、不堪忍受、不可思议的遭遇忘得干干净净，这是在漫长的劳改生活中难得的暂时安乐。几天的休假一晃就过了，队部一声令下准备出发，从此犯人们又重新陷入苦难之中。



上年春，我们来到西山咀时铁路路基已填好，只因没有道渣未铺设铁轨。春节过后我们离去时，铁轨已由包头铺到包兰线中点银川附近。因此我们这批调往内蒙保安沼农场的犯人便在西山咀南面不远的小车站上火车，所乘仍旧是铁皮货车厢，不过比以前几次稍微宽松，每人可有容纳身体的铺位，这对犯人来讲可算是一种享受。登车前每人发给加了盐的窝头作为一路的口粮，在饥饿中也是美味。在行车途中克制着不敢多吃，唯恐只顾一时吃得痛快，把口粮提早吃完了以后没有吃的而挨饿。

所乘这列车是慢车，须在其他各车次的空隙间穿行，停的次数多，停的时间长，是特别慢的专列。在停车时每天供应两次开水，倒一次马桶。每人各自带了粮食，不需开饭，省掉很多麻烦，这恐怕是干部从多次押送犯人中得来的好经验、好办法。

就这样度过了一天两夜，车厢内气温逐渐降低，据说已经过了北京和天津出了山海关。自山海关到我们的目的地内蒙和黑龙江省交界处的保安沼农场还有几百公里。由于火车自天津过后便从向东行驶转为向北行驶，纬度渐高，气温渐低，所乘的铁皮货车厢散热极快，不能保温，车厢内冷不可当。当夜蜷缩在车厢内，次日凌晨到达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平洋镇下车。

当时天已微明，太阳还未出来，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刻。下车步行约一公里在一所学校内吃早饭，是小米稀饭加咸菜。我的手已冻僵，碗都拿不稳，筷子更拿不住，只是趁热喝了一碗稀饭。从关内来的人初次领教到高寒地带低气温的威力。

饭后犯人们便步行去保安沼农场第二大队，那里便是安插我们这批犯人的地方，离平洋镇约20公里，步行须四个小时。我们的行李有农场派来的大车运送，人是步行，但年龄大和有病的人可坐在大车两边车杆上。接近中午到达了目的地。所谓农场实际上是个大监狱，各大队是农场所属的劳改单位。当时已在那里的劳改犯都在搞基建，如修路、建房、平整土地、开水渠等等，为农业生产打基础，实际上什么农作物都还没有开始种。在西部启程前干部所谓主副食品丰富，自给有余，不会再挨饿等等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这愿望的实现须在遥远的将来。

来到保安沼农场的第二大队后，队部即对犯人进行分配住房。那是一排排朝南的土坯平房，整齐地排列在大院子中，大院四周有方形围墙，围墙四角有岗亭，由武装人员站岗。所有平房都是一式一样，每一排平房共有八间，分两个通道进。每两间住一个小组。每间分南北炕。每炕住六人。共计24人。大院中约有二十多排平房，分成四列。其中除住犯人外，其余是大伙房、仓库、办公室、医务室等。

我们到达时已有一部分犯人住在里面。当天打扫卫生、糊门窗、运草烧炕等搞了一下午杂活。

晚上队部即下达劳动任务；打冻方开水渠。因为我们在此是临时性的，所以没有重新编队，即按原编制不动。劳动地点离队部较远，所以第二天一早出发前除领工具外每人还带上干粮作午饭。去工地的路上有武装人员押队，工地四周有武装人员放哨。中午时分每人拿出用毛巾包好的窝头当午饭。我仍是吃乙等饭，三个鹅蛋大的玉米窝头，只是干啃，没有水喝。虽然口渴，却有好处，可以减少小便。因为在严寒朔风中脱了手套解裤子是件苦事，冻僵了的手解扣子和扣扣子都很困难。

在这高寒地带的冬季，没有寒流风不很大时犯人还能顶得住，一遇寒流就难以抵挡。尤其是犯人们吃不饱，个个骨瘦如柴，抗寒力极差，不久便有不少人支持不住病倒。医务所开病假条很严而队部批假更严。我也因受寒感冒，头痛发烧，但不给假，只好带病出工，熬到收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大队。我怀疑一个人在这样的高压和磨难下，时间一久，是否会把锐气磨尽，成为逆来顺受没有半点反抗性的可怜虫，甚至被折磨至死。但自忖我还不至于落到这样可悲的境地，我有可能活到重见天日、重放光明的一天。这信念支持我顽强地活下去。

保安沼农场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之南约50公里处，是黑龙江省江桥县与内蒙扎赉特旗交界点，属亚寒带，冬季漫长。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的一个月内，每天早晚上冻，中午前后开冻，气温在摄氏零度上下徘徊，要到四月下旬才不上冻。五月中旬树木花草才开始抽芽，河边的枝头渐渐出现嫩绿。正在这大地回春之初，劳改犯又开始调动。

这次的任务是去修旱坝。我在毫无思想准备下匆匆打起行李，肩背手提地随众步行到紧靠旱坝的新驻地：邢家中队。犯人住所是很多的小型草棚，分布在旱坝北坡，都是我们到达前临时搭起来的。因为没有窗户，里面黑洞洞，地上很潮湿，发出一股霉味。我们一到便四出收集枯草铺地，安放行李，摊开被褥，就此落户。

到达后第二天便开始修坝。所谓坝是以前劳改犯修建的防嫩江支流绰尔河泛滥的堤。高约三公尺，底宽约五公尺，面宽约两公尺。由于高和宽都不够，上年绰尔河秋汛期间河水涨过坝顶，且把坝冲出几个缺口，洪水流进坝内，淹没了农场大片土地，许多庄稼被毁，于是当局拟订了修坝计划。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坝加宽加高，修补缺口，总的土方量要比原来的多一倍以上。

施工规则规定取土须在坝里坝外 50 公尺以外，往坝上填土时须填一层打一层夯。由于运距既远又须爬坡，工程十分艰巨，尤其是填缺口更不好干。因为缺口处被激流冲成深坑，坑内积水，必须先把积水排干后才能填土。

土方因此增加了几倍，取土也取得更远，劳动强度极大。劳改犯久经粮食定量的煎熬，体弱力薄，对于超出体力的高定额无力完成。于是队部下令延长劳动时间，早晨天未亮就起身，在昏暗的黎明中吃饭后即出工，晚上要干到日落才收工。在这种情况下吃丙等和乙等饭的老弱陆续死亡或调到病号队，每个小组的人数逐渐减少。我小组原有十多人，后来剩下不到十人。以前吃甲等饭的人多吃的粮食是从吃乙等饭的人的口粮中匀出来的，现在吃乙等和丙等饭的人减少了，可匀出的口粮相应减少。于是剩下的人不得不吃得更少。虽然甲等饭仍然是四个窝头，乙等饭仍然是三个，但个头越来越小，这对劳改犯的威胁就更大。

时入夏令，工地一带和工棚附近野草丛生。据认识野菜的人说，其中有野苋菜和灰菜可以吃。于是劳改犯在中午或收工后到处去挖野菜，用脸盆煮来吃。好在那里到处有枯枝干草，用之不竭。我因吃不饱也挖野菜来煮了吃，略带苦涩味，但还鲜嫩。小组中有人去大伙房偷了些盐加在煮好的野菜中便成美味。有人在取土时挖到一种块茎，形似小萝卜。

吃过的人说，略带甜味，很脆嫩。但多吃了腹痛呕吐，还有一人死了。后来听说这东西叫“狼毒”，有剧毒。还有一种叫“走马芹”，生在水边，形状和芹菜一样，只是叶尖带红色，气味也如芹菜，只是气味特别浓，也有毒，吃坏过人。我挖了闻了闻，觉得有些恶心，没有吃。队部对劳改犯吃野菜不闻不问，因为他们也明知劳改犯吃不饱，所以只当不知。于是吃野菜一时成风。好在野菜大片生长，到处都是，挖不完，只是越挖越远而已。

在当时紧张的劳动中，每天收工已近黄昏，晚饭后还要学习，大家累得坐都坐不住。有一天收工后大队召集开会，是因为工程进度慢，督促犯人加紧劳动，务必在汛期前完工。大会开完后已很晚，中队还要求各小组讨论，个人表态，作出保证，进行挑应战等等，以至过了熄灯时间很久，队部还不通知就寝。大家疲倦之极，连话都不愿讲。我也是困得连眼皮也睁不开，实在无法再做各人的发言记录，支撑不住便不等队部下指示，自作主张叫小组的人摊铺睡觉。大家求之不得都匆匆地睡了，唯有劳动组长一人仍不睡，一言不发地坐着。我以为他在思考什么事，也不去管他，自顾自地睡下，倒头便入梦乡。哪知第二天晚上事情就来了，队部通知我去。

“昨晚你们小组什么时候睡的？”指导员问我。

我一听知道事情不妙，准是有人向队部打了小报告。事已发生怎么办？只好等着瞧吧。

“很晚了，已经过了熄灯时间了。”我答道。

“讨论好了没有？保证书、挑应战书都做出了没有？队部有没有通知结束学习？”。

“讨论是讨论好了，保证书和挑应战还没来得及做完。”。

“有人检举说别的小组都还在学习，热烈发言讨论，你们小组却未等队部通知由你发号施令叫小组睡了。有没有这回事？”。

“我看大家太疲劳了，便叫大家早些睡，早起好干活。”我无可奈何地回答，避免正面回答他的提问。

“太疲劳了？就你们小组疲劳，别的小组不疲劳？你强调疲劳，不遵守学习制度，身为学习组长，不等队部通知便擅自带头先睡，还叫大家也睡，你犯监规错误，叫大家跟着

你也犯错误。这是什么改造态度？以前有人汇报过，说你对学习抓得不紧，学习时疲疲沓沓，我不相信，现在证明确是如此。你思想落后，不想争取进步，你小组中自有想争取想进步的人。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不断地向队部汇报。今后我另找人当学习组长，不要你当了。回去写一份检讨书来，写得不好，认识不够，还要处分你。”

我无话可说，怏怏地走回小组。指导员所说有人不断地汇报我，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对革去学习组长毫不在意，不当学习组长可少与干部们打交道更求之不得。他们那一套令人生厌的教条，幼稚可笑的训话，实在使我恶心。可是事情恐怕不会就这样简单地了结，麻烦可能随之而来，因此心中惴惴不安。

过了两天，在晚间学习的时候，指导员来到小组，宣布了我所犯的错误，革去我学习组长，并另指定一人接替我。不久以后，大约不出一星期，果然不出我所料，问题来了。有人向队部汇报，说我劳动松懈，不卖力；劳动时大小便次数多，借此磨洋工，逃避劳动；挑担子跑得慢，装筐装得浅等等。队长叫我去谈话时先把别人的汇报读给我听，然后问我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当即否认并说：

“我本来就是乙等劳动力，不能与甲等劳动力比，在劳动中我实在已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你说你已尽到力量，为什么有人汇报你不汇报别人？你诡辩没有用，要拿实际行动来证明。今后我就看你的具体表现，你如不好好干，就把你降吃丙等饭，否则别人也会有意见。”

队长说到此便叫我回去，这次没有叫我写检讨，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从队部出来走回小组，心中老大不悦。真是祸不单行，先是说我学习不好，继而说我劳动不行。在劳改队中肉体上既受尽苦楚，精神上又受折磨，这种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尤其是对降吃丙等饭真有顾虑，更确切地说是恐怖。大多数过去吃丙等饭的人是怎样的下场我知道得清楚，简直可说是走向死亡的道路。在这样的高压和威胁下，我不敢不卖命地干，表现出我不是偷懒耍滑，而是尽力而为，以希冀度过这一难关。幸而以后队部没有再来找我，降我吃丙

等饭的事并没有实行，也没有再提此事，这一危机总算挨了过去。

## 新大队长

修坝工程进行了两个来月，时令进入盛夏，离淖尔河汛期已近。干部们无止无休地督促，劳改犯没命地苦干。这样还嫌不够，还说劳改犯不卖力，工效不高。据说原来的大队长由于思想落后，立场不坚定，督工不力，掌握失当被撤职调走了，随后即调来了新大队长。

有一天收工后吃过晚饭已经天黑，大队召集开会，新大队长来作报告和讲话。大会是在坝边一片杂草地上开的，用木头搭起了一个台，用好多盏马灯照明。四周黑暗中闪烁着手电筒的光，那是武装人员在警戒。新大队长讲话的大意是说劳改犯劳动不紧张、工效低，汛期快到，修坝工程必须在洪水来到之前完成，以后要开评比会、奖惩会，对表现好的要奖励，对表现不好的要处分等等。他讲话声音之大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把扩音器震得直颤动。同时还指手画脚，摇头晃脑，如同疯子一般。所讲尽是陈词滥调，但充满了威胁和恫吓，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他那形象在马灯昏暗的灯光中真像一个魔鬼。他一直讲了很久很久，直到深夜。连篇废话讲个没完没了，无非是一种自我表现。其间我已困得睁不开眼，间歇地打瞌睡，想到明天天未大亮就要起身去劳动，心里真不是滋味。

第二天那大队长来到工地，手里拿了一根棍子，后面跟着几个干部，各处巡视，见到有劳改犯挑担子跑得慢些便大声辱骂，并用棍子抽打。在取土坑中见到装上土的箩筐，便嫌装得不够满，自己动手用铁锹死命地往上加土，拍实了再加土，直到高出箩筐边沿二十来公分实在加不上了为止，并令装筐的犯人照样把所有的箩筐都装得同样满。照这样满的一担土至少在60公斤以上，一般体力的人是挑不动的。有个别年轻力壮的人试着挑，也是挑不多远便要歇担，有人还把扁担挑断。那大队长还嫌劳改犯不卖力，在坝顶上又说打夯打得慢，督促加快速度。他走到那里便骂到那里。挑担的见到他便躲开，整个工地有他一

到就引起骚动。

此后他又来工地多次，每次必找碴兴风，随意骂人打人，可怜的劳改犯都怕他，背地里称他为“疯子队长”。他是否真正神经不正常，或虐待狂？其实不是，即便他打人也并未过重，并未打坏过人，那种嚣张行径是装出来的。由于他的前任是因督工不力而被撤职调走的，他上任后不得不加紧督促，从严从酷奴役劳改犯，务求工效有所上升以显示他的积极和负责，否则便会重蹈前任的覆辙。

说到这大队长使我联想起以前在苏北农场种棉花时的一个中队长。他为人通情达理，对犯人很照顾，从不苛求，是劳改干部中少有的。劳改犯中个别不识时务的蠢货为了表示对他的好感，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菩萨队长”。由于劳改犯们对他有好感，这绰号便在劳改队中传开了。可是出乎意料，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忽然改变常态，对犯人特别严格起来，有时竟达到蛮横的程度，甚至连病假也不批准，强迫病号出工。大家对他这180度的转变，感到非常惊讶，莫明其妙。不久以后从大队部的通讯员处了解到事实真相，原来是由于“菩萨队长”这绰号传到了大队部，再传到了指挥部。上级追究这绰号的起因，于是那中队长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他立场不坚定，庇护犯人。他一方面为了表示纠正“错误”，一方面由于犯人起了绰号害了他，为对犯人报复于是突变常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出乎常情地虐待犯人。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们对他倒无从抱怨，只好责怪取这绰号的犯人没有头脑，浅薄无聊，害了那中队长，也害了大家。

## 汛期

东北地区的夏季，很热的日子不多，最热时白天也不过摄氏三十度左右，夜里只有十几度，睡觉时还要盖被子。在那里见不到扇子和凉席这种东西。气候不很热对犯人来说却有好处，劳动时流汗不多，体力消耗较少。修坝的任务按原定计划须在汛期以前完成。那洪水一方面来自绰尔河上游兴安岭地带的冰雪融化的雪水，一方面来自雨季的大雨或暴雨，

两者汇合成巨流溢出河床，造成泛滥。

时至八月上旬，汛期已到。有一天中午，防汛指挥部的人员赶到工地说，上流有电话打来，通知劳改队洪水当天要到达当地。我向坝外和上游观望，当时烈日当头，晴空万里，视野很远，可是一点洪水的影子也看不到。过了约两小时，有人大喊：“洪水来啦。”我向上游一望，起初什么也没有看见，仔细一看只见远处有一线白光沿着地平线在闪烁。不久那白光渐渐移动过来，愈来愈近，才看出原来是洪水前沿的浪花，在太阳照耀下反射出白光。那洪水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万马奔腾，气势磅礴，只不过是高出坝外地面不到半公尺的水流由西向东推进。小树土墩仍露出在水面，而且水流动得并不很快，声息全无，毫不惊人。可是由于洪水已溢出河床，高出地面，面积极广，流量当然可观。

就在当天下午大队下达命令：

“由于工程进度没有达到规定的指标，现在洪水已到还未完工，为了紧急抢险，所有犯人立即分为两班，集中在旱坝的薄弱环节日夜开工。”

所谓薄弱环节是指坝顶高度不够、坝身宽度不够、坝脚有塌陷之处以及上年被水冲开的缺口地段。当天分班时我分在早班，即从早晨六时到下午六时。分完班已近傍晚。于是编在早班的犯人收工回去，编在晚班的犯人继续开工，时间是从晚上六时到次日晨六时。

第二天我一早到坝上一看，吓了一跳。坝外的洪水已接近坝顶，坝外一片汪洋，除少数大树还露出一些树梢外，其他全被淹没，什么也看不到。一夜之间，坝外的景象大变。

当时我被分配在一段坝脚塌陷地段。先是把土倒在坝外侧的坝脚处，但因水流较急，泥土一倒下去即被水冲走，存积不住，不起作用。于是运来大批草袋，把附近割来的树枝杂草掺入土中，然后装入草袋推到坝脚，这就不致再被水冲走。这样干了两天两夜，沿坝外侧的许多坑总算填满，装了土的草袋露出水面。可是不幸下起暴雨，水位又继续上涨，离坝顶只有半公尺，情况紧急。当天队部下令不论早班晚班全部投入抢险，并从其它地方调来犯人协助，一时无数人头在暴雨中攒动。

东北地区的夏夜本来就不热，一下暴雨气温更低。犯人们浑身湿透，冻得发抖。我从



小耐寒，至此也觉难忍，只有加油地干才能抗得住。当时天空乌黑一片，闪电和雷声连接不断，只有坝顶少数马灯照明，工地上一片混乱。工地外围有武装人员巡逻，手电筒忽明忽暗，坝内昏黑如漆，再加杂树丛生，我想到当时如要逃跑正是好机会。但逃了出去何处栖身？再加饥寒交迫，混身乏力，连走路都勉强，倒了下来恐怕只有饿死冻死。在当时情况下即使逃了出去，也难以活命，在极度衰弱中勇气是鼓不起来的。

当夜犯人们在暴雨中为抗洪奋战了一整夜，破晓时雨停云散，东方发白，红日渐渐升起，水位开始下降。据上游传来消息，洪峰已过，情况转缓。大家一夜没有进食，没有喝水，已饿极渴极。不多时窝头和开水送到，由于任务紧急，情况特殊，队部破例开恩，没有按定量分饭。犯人们此时既吃到了东西喝到了水，又得到了暂时的休息，而且又遇大晴天，阳光和煦，天气转暖，与昨夜相比，恍如隔世。

饭后继续开工，到中午时分，水位下降了约一公尺，对旱坝的威胁已消除，情况已转危为安。我们早班的犯人已连续干了三十多小时，奉命收工。事后有不少人病倒了，我总算幸免。我小组中有一犯人，在这次抢险以前就生了病，队部不给假，说他是怕苦怕累，在这紧急关头装病，要逃避劳动，于是强制他出工。经几天抢险后收工回来，他的病情加重，夜里不断地呻吟，闹得旁人睡眠不安。次日一清早别人都起来了，他仍睡着不动。小组长去叫他起来，他不作声。推他也不动，一摸他胸口心脏已停止跳动，死了。他的死是劳改犯结局的一个典型，我自己很可能也落到这种下场，不免悲伤。

洪水泛滥的险情过去了，夜班也不开了，劳动和生活恢复正常。又过了几天，坝外的水全部退入河床，坝脚也露了出来，只是已被洪水冲刷得坑坑洼洼，面目全非。

除留下一部分人修整坝基外，其余大部分犯人转入一项新任务，即修整农田。那时农场当局已调来了若干辆苏联制造的大型拖拉机叫做斯大林 80 号来开垦生荒地，辟为水稻田。我们的任务是跟在拖拉机后面，把没有翻转和没有翻平的筏片翻过来并铺平。每一辆拖拉机配备一个小组二十人。这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实际干起来很困难。因为这里的生荒地是从未开垦过的草原，土地表层全是茅草根，密如丝瓜络而且很坚硬，只混有少量泥土。

非用磨得飞快的钢锹先把未翻转或隆起不平的筏片切成短段，才能翻转和铺平。遇到土地不平和拖拉机拐弯处，筏片乱七八糟，工作就更困难。大家竭尽全力还是跟不上拖拉机，只有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勉强完成任务。到收工时大家累得话也不愿讲了，闷闷地走回住所。

到了这个阶段，犯人们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生病和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时中队从已经由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队弄来了黄豆荚和葵花籽盘，这两样东西本来是做燃料的，队部叫大伙房把它磨作粉末，掺在玉米面中做成窝头，给犯人们吃。窝头个儿较大，吃起来略带香味和甜味，十分可口，而且数量增加了吃得也略饱，大家很满意。不料吃了几天之后大便秘结，解不下来，不得不死命地逼才能解出，因此肛门胀破流血。毛坑中一片鲜红，好似杀了鸡鸭。我当然也不免遭殃，不去大便肚子胀，去大便又疼痛难熬。我有一次解出一半，另一半塞住了肛门，不得不用手指去抠才抠了出来，那半截大便已坚硬如石块。肛门本来已破，经此一抠破口更大，血流不止。有一部分人始终解不出大便，犯医使用勺子去挖。据说有两大便秘严重，动了手术才得疏通，但还未听说有人因此病倒或死亡。由于出了这一事故，队部指示大伙房停止把黄豆荚粉等掺入玉米面中做窝窝头。

平整田地的工作进行约三个多月，面积已达几千亩，已够春播所需的数额。当时劳改犯的编制以原来的中队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划分给千亩左右田地从事农业生产。其中大多是水稻田，间有少量的旱地种大豆、玉米和各种蔬菜，还留有几十亩作为果园和苗圃。我所属的中队傍着旱坝，有一曲小溪水穿过境内。两旁杂树丛生，景色可算优美。当地的天气到了十一月中旬已入严寒季节，溪水结成坚冰，土地已上冻，拖拉机开不动了，于是平整田地的工作停止，转入修路和打冻方开渠道。

## 严冬

冻方这一名词南方人是不大了解的，南方没有冻土，所以没有这工种。所谓打冻方是用镐打冻土开出渠道，作水稻田排灌之用。工效以打出的冻土的立方公尺为计算单位。那

时的工地离中队较远，步行须半小时，因此午饭在工地上做，在工地上吃。做饭的场所是空旷地上孤零零的一间茅草屋，门窗不全，用芦席掩盖，冷气不断透进。屋里昏暗，看不清东西，只有用干草生起了煮饭的火，借火光照明。伙房来此做饭的犯人干这项工作也真苦，不过比我们这批在露天旷野中顶风劳动的犯人总还好过得多。

饭是用苞米碴加土豆块煮成的稠稀饭加盐而成。严寒中在户外吃饭，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食物较久地保持温度。由于主食中加了土豆，数量较多，每人可分到三小碗，一般饭量已够吃，分等级吃饭的办法不再实行。但还不能自由盛饭，否则还会发生混乱，仍须由小组值日人员掌握分饭。每人三小碗分过后如有剩余即分给饭量大的人吃。

有一天遇寒流来袭，气温骤降。东北高寒地带每遇寒流都是晴天，但那种晴天与一般晴天不同。一般晴天天空呈蓝色，太阳呈金黄色，阳光照在脸上感到有热力。寒流时的晴天天空呈灰色，太阳呈惨白色，阳光没有热力，天空一片迷茫。那天一早出工时，天还没有大亮，风声呼啸，冷不可当。到了工地大家不得不加劲劳动，否则便抗不住严寒。当地居民在三九天不出外劳动。犯人们非但要出工，而且整天长时间地在旷野劳动。

那天到了中午开饭时间，我正好轮到值日，便和另一值日犯人担任去小茅屋取饭和给小组分饭的任务。取饭用扁担去挑，两桶饭也不重，路也不远。干这项工作可戴手闷子，不致冻手。可是分饭戴了手闷子便拿不住小铅碗和盛饭用的木括子，而且每盛了一小铅碗后必须用木括子压实刮平，倒出后还要刮干净，否则别人会认为分饭不公正，小则提意见，大则可引起吵架。这些动作只有光手才能干得来。平时天气不太冷时，值日两人轮流分饭，冻手还不严重。这次遇寒流，轮一次分饭虽只几分钟，两手就冷得生痛以至发麻。饭后我和那另一值班的手都冻得疼痛僵硬，握不住铁镐，不能打冻方，只好挑运打下的冻土块。

收工时那另一值日犯人挑空饭桶回队，规定可先走一刻钟，回队为小组挑洗脸水，我随小组一起走。他乘先回到中队打洗脸水之便，一到宿舍打来了热水便把双手浸入热水中。这下子可出毛病了，他的手指立刻变色，由白转紫，受冻严重的手指由紫变黑。

据当地人讲，手脚、鼻子、耳朵受冻后切忌用热水浸捂，这样就要烂。最好的办法是

用雪搓，搓到皮肤由白转红就没事了。我因小组十多人只有两盆洗脸水共用，嫌太脏，尤其是小组中有一犯人有梅毒，所以我经常不与小组共用热水，只是在室外沟中取水雪，用雪放在炕旁化成雪水来用。幸而如此，我受冻的手没出毛病。那人的手变黑后开始溃烂，虽经敷药治疗，久不痊愈，发出恶臭，劳动已干不来，只能干些轻活。在春初的一次编队中把他调走了。在劳改队中犯人一经调散，便是生离死别，永无通音讯或重聚的可能。那人与我相处很好，可是他调走以后，关于他的一切情况我便一无所知了。据本队的犯医说，他的手已没好的希望，至少要截去几个手指。在当地的劳改队中冻坏手脚的人常见，不足为奇。我曾见过好几个缺手指脚趾的犯人。我的耳朵曾冻坏过，溃烂流脓，倒不很痛，只是痒得难受，忍不住要搔，非搔到流血不止痒。夜里睡觉，我习惯侧睡，耳朵贴枕头，枕头上满是脓血，受了一冬天的罪。我对耳朵烂掉并不在意，因为对我没有多大影响，不会妨碍听觉，只是不太雅观而已。我的耳朵春暖后渐好，但第二年冬又犯。后来东北的气候渐渐变暖，耳朵的冻疮也慢慢地好了。

在我初到东北时，冬天寒流很频繁，一个接一个，冬季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是经常的事。后来寒流渐少，气温也慢慢变暖。这可能就是气象学家所说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起了温室效应的原由。这一气候的变化给当地的劳改犯帮了大忙，减轻了不少苦难。

## 大跃进

冬去春来，天气转暖，时令进入备耕农忙阶段。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修整水稻田，在已平整的田地里打起池埂，把大面积的田地隔为四亩左右的小块，整个中队共承担近一万亩。每小组二十人，每人约摊到三十多亩，在全国水稻种植的人均负担中属最高，劳改犯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队部为了要使劳改犯的工效提高，多干活，在粗劣的粮食中搅入土豆、胡萝卜、菜根之类，这些东西可从别的大队调来。这样每人可以多吃到一点东西，以往成天挨饿的苦难以减缓。

1958年前后，政府大肆宣扬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据说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旨在提高生产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三项中唯大跃进与劳改农场最有关系。劳改农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须用大跃进的精神促使劳改犯挖尽潜力投入生产。于是当局命各大队分别召开大跃进誓师大会。各中队事先叫各小组写出发言稿，拟订保证产量的保证书以及各小组和个人的决心书、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挑应战书。我小组在商定保证产量时讨论了很久，把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都考虑到，经过一番争论后才把保证产量定为每亩八百市斤。其实这已是过高，此后多年的实际生产中从未达到此数。

到开大会那天会场布置得很壮观，红旗飘扬，标语似海。因为天热，大会在下午收工后开始。先是大队干部作报告，大意是毛主席党中央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号召全国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劳改队也不例外，要努力提高水稻产量，责成各大队各中队以至各小组要定出保证产量，有计划地实现增产和丰收。

随后各小组发言表态，并宣读保证产量的保证书。先进行宣读的几个组都定在一千市斤左右，其间干部插话督促大家要打破保守思想，大胆高攀。经此暗示，后来各小组所报数额好像拍卖行中的报价争购，愈报愈高，由一千多市斤报到四、五千斤，最后报的一个小组竟报到万斤，引起全场一阵哄笑。可是干部却郑重其事加以表扬。大会最后进行挑应战，内容也是荒谬之极的一派胡言。时至子夜大会才告结束。

此后不久，中队召集开会，首先批评有些小组过于保守，产量报得过低，应向报得高的小组学习。随后传达一项消息，说是在毛主席倡导的大跃进的感召下，天津地区某一水稻试验田创了水稻高产新纪录，亩产达二十万市斤。大家听了为之愕然。我却并不吃惊，只是窃笑，因知这是明显的骗人，只觉所用方式幼稚可笑而已。当时我还以为是劳改当局的无知之辈臆造的谎言，哪知是遍及全国的官方宣传资料，这倒是使我大为吃惊。这件事在老一辈中记得的人不少，在青壮年中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这些消息的宣传和流传是千真万确的事，当时各大报刊都登过，真是毛泽东时代的又一奇迹，足以传诸后世的“佳话”。

## “上诉”与复判

有一天晚饭后，大队召集开会。每次大会照例必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要传达，而且自上次开过大会以后已很久未开，这次开会大家料不出是什么事，忐忑不安。大队的干部登上临时搭起的木板讲台用扬声器高声宣布：

“政府为了体现法治精神，向你们宣布，你们中间如有人确认对自己判刑所根据的罪行与事实不符，或认为量刑过重、判刑不公等情况，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向各自的原判刑法院提出上诉。队部负责给你们转达，但决不允许投机取巧，乘机翻案，否则后果自己负责。有文化的人尽量自己写，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确实写不来的人，可通过队部批准，托别人代写，期限为一个月，到下月今天截止，决不延长。”

这件事很简单，就是允许犯人上诉，然而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这些反革命犯在宣判时当局即声明不发给判决书，不准上诉，现在却来了这样一个转折。大会散后，大家回到工棚。一时人声嘈杂，议论纷纷，都在谈论此事，一直到熄灯后仍未停止。我思想上也起了波动，心想判刑时虽未发给我判决书，但在宣判时因内容很简单，我记得很清楚。一是收听“美国之音”造谣，二是企图搞反动组织，三是企图赴港投匪，只有这三条。

在解放初期当局并未禁止收听外国电台，我的亲友同事中凡有短波收音机的人家几乎没有不收听“美国之音”的，一则由于它的电波强，音量大，容易收到；二则由于它报导全世界的新闻，内容丰实。政府并未明文禁止且又未违犯法律的事，怎能认为犯罪？其次说我企图搞反动组织，纯属子虚，是罗织的罪名。再次说我企图赴港投匪，我是有赴港的企图，但并不是要去台湾，而是要去美国，去纽约联合国求职。在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下想要去美国和去台湾是同样被人认为是极反动的罪行，并无多大出入，在这一点上没有申辩必要，可是这后两项都冠以“企图”而判刑。想到这几点，我如上诉，是有充分理由的，也许会得到减刑。至于复判无罪是没有可能的，我也不存这种奢望，因此跃跃欲试。

第二天收工后，大院中、墙角墙边、工棚内外，已有不少人开始在写。想要上诉的人

绝大多数是反革命，其中没有文化的人很少。我独自找了个僻静地点正要想开始写，忽然另一念头潜入我脑海中。这次政府破例开恩，允许犯人上诉，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目的何在？都没有交代清楚，使人摸不清底细。贸然去上诉会不会出问题？过去由于轻信吃过大亏，这次应慎重考虑，不可大意，于是停笔凝思，暂不动笔。可是是否放弃这个机会，不去上诉，还未下决心。因为这件事对蒙冤受屈的犯人来讲具有巨大的引诱力。由于离上诉截止日期还远，暂时抱了等待观望的态度，不必心急。

想到过去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使我对政府的政令、号召以及很多的作为存有戒心，其中不少是出于欺骗，引蛇出洞，使人自愿上钩。较为重大和突出的事件是上海解放之初突击封闭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号。证券交易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经济活动，解放前在上海极为盛行。解放后从事证券交易的人鉴于这种经济活动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大多数人已缩手不干，证券交易一落千丈，几乎陷于停顿状态。然而出人意料，政府对这项经济活动并不下令禁止，而是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字号虽然门庭冷落但仍开张营业。当时上海游资缺乏出路，人们看政府一时不会禁止证券交易，即使以后要禁止，等命令下来以后再停止不干也不晚，于是放心大胆地又投入证券交易。证券号的资金和客户的保证金，大多是黄金和美元，也愈积愈多，一时营业鼎盛，规模庞大。正当此际，有一天深夜，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把证券交易所和全市所有的证券号全部查封，所有的证券和流动资金全部没收，一部分经纪人中的巨头也被扣押。这一事件知道的人不很多，因为它只发生在上海一地，而且受牵连和受影响者只限于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小圈子。当时我自己和有些熟人正在作证券交易，也受到损失，我对此事件自然有很深的印象。

另一事件是反动党团登记。解放后一年多，政府号召全国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团员以及其他被列为反动组织的成员，都要向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并宣传说，登记之后可放下思想包袱，轻松愉快。我在被捕前不久曾在报纸上、大街上看到很多这类布告。可是在1951年4月27日凌晨起，全上海大批军警特工人员突击出动把凡登记过的人按名单搜捕入狱。这就是震惊人心的所谓“四二七大逮捕”，范围是全国性的，上海不过是个

重点。我在市公安局看守所拘留中，同监房中有一人对我说，他是国民党员，看到报上登载的反动党团登记的布告后便按报上所载手续拿了证件去公安局登记，并拿到了登记证，他心中一宽，以为没有事了，哪知现在被捕了，真不懂是怎么回事。

此外我在税务局工作期间，局方人员有时对公民不说实话，原因是恐怕引起公民不满，造成工作上的困难。我曾流露了我的不同看法，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应对老百姓说真话，不应欺骗老百姓，即使遭遇周折，也应另想解决办法。哪知我因此遭到指责，先是说我思想落后，没有立场，继而斥我为反动，终于发展到被扣上反革命帽子而被捕。回想起来，我的遭殃虽还有其他原因，但肯定与我暴露了政府不应欺骗老百姓这不同意见有很大关系。

经过了反覆考虑，感到上诉是凶多吉少，于是决心放弃这一念头。经过队部批准，我代别人写了几分上诉状。我本人在上诉与否之间选择了后者，当时后果还不得而知，因上诉而得到好处的可能性还不能肯定没有。上诉截止的日期还未到，想要上诉的人都已上诉了。全大队上诉的人共有多少，没有宣布。此后经过了有半年，此事杳无消息。有人耐不住了去问队长和指导员，都碰了钉子，不得要领。后来也没有人再敢去问了。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大队召集开会，宣布上诉后复判的结果。上诉的人紧张起来，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屏息倾听。我未上诉，无动于衷，好似隔岸观火。大会进程中先是开场白，简单地说上次上诉的复判，已由各地法院寄来，现在向大家公布，随后宣读维持原判者的名单，加刑一年者的名单，加刑两年者的名单，加刑两年以上者的名单，减刑者一个也没有。另有一人，他自己并未上诉，也加了刑，原因是他未经队部批准，擅自代好几人写上诉状，据说还取报酬，因此被扣上有意助长右倾翻案风。

最后大队首长讲话，大意是：“这次上诉的人这样多，经过各地法院审查，大多数人是想投机取巧，无理取闹，故意掀起翻案风。这次从宽处理，加刑很轻或维持原判。今后就要从严。”讲完后宣布散会。这一下凡上诉的人大失所望，被加刑的人更是沮丧之极，可是敢怒不敢言。我也想不到这事真会不出我所料又是一个骗局，我私下庆幸没有上诉，否则减刑无望加刑却有可能。还有很多上诉过的人没有宣读到名字，原因不明，这些人不



敢也不必去追问原因，此事也就不了而了。

此后不久，劳改队中进行反右倾学习。从动员报告和学习文件中得知社会上有一批人掀起右倾翻案风。以共产党的立场和逻辑来看这是与社会主义路线不相容的，必须加以反击。我从中体会到在劳改队中，当局第一步号召犯人上诉，第二步复判加刑，这两部的连结便形成这出闹剧。这与毛泽东先是号召“大鸣大放”，继而把那些响应号召者扣上右派帽子而加以清除的把戏同出一辙。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由于盲目信任、盲目崇拜毛泽东，以为他开放言论自由，热衷于进忠言而暴露了思想，于是给专政当局提供了迫害的目标。这些事实足够说明我对共产党当权者和专制政府不信任和存有戒心，是有根据的，并不是无谓的多疑和空洞的臆测。

很可笑的是此后我竟得到队部的表扬，说我这个知识分子能说会写，可是觉悟高，安分守己，不去起哄上诉，说明能认罪服法，安心改造。后来劳改当局为了完善管教制度，实行对劳改犯年终考核。于是我历届的年终考核表上都注上了“认罪服法，安心改造”这项优点。至于这对我是否有利却始终没有看出来。

### “自愿留场”

我所属的中队一连几年从事水稻生产，大部分犯人种水稻，少数人分担菜园、苗圃、饲养、大伙房、医务所、修缮等杂务。我是没有技能的，只有干笨重的水稻田劳动。

当地正当北纬47度，据说是全国或竟是全球纬度最高的水稻田。因气候冷，每年须在六月初才能下种，至秋九月中旬收割。其间任务很多，开垄、拔草、排灌、修渠、脱坯等非常紧张。为了抢时间，在收割和搬运中，全中队压缩其它劳动，人员全部投入。开始脱粒须在十一月中旬。那时气温已降到摄氏零下十来度，把脱粒场地全部浇水结冰成为冰场，然后才能进行脱粒，否则场地坑洼不平，泥土沙石将混入稻粒。脱粒时日夜分班开工，必须赶在翌年二月下旬开冻前完成。否则冰场一化，满地泥水，工作便不能进行。所以在当

地种水稻可说是与时间赛跑，与气候比速度。

结果无非是犯人受罪，无时无刻不在紧张劳动中过生活。尤其是六月初春播时，冻土底层还未融化，稻田中的水接近零度，犯人须赤脚整天浸在冰冷的水中操作，双脚冻得发红，实在难受。我起初不能适应，还经常因此感冒。农忙季节不批准病假，只好带病坚持。严冬夜班脱粒情景更是令我难忘，那时气温已在摄氏零下30度左右。劳动稍一松懈便冻得受不了，只有不停地干，不停地跑动，才能顶得住。同时脱粒机的噪音彻夜不断，震得人头脑发胀。喷发出来的稻粒、稻芒、稻叶弥漫空气中。在昏暗的灯光下，茫茫的夜色中，人影攒动，尘土飞扬。犯人在极度疲劳极度瞌睡中经常发生跌倒、碰撞脱粒机等工伤事故。有几个犯人在脱粒时由于精神恍惚，手臂卷入脱粒机折断，造成残疾。夜班脱粒那种紧张可怕的场面，至今我回想起来犹有余悸。

由于当地属黑土地带，比较肥沃，又是由生荒的沼泽开垦成稻田，泥土中养份充足，因此水稻产量很高，单季稻每亩接近300公斤。可是犯人平时吃不到自己生产的大米，绝大部分向外供应。据说因为质量好，胜似无锡上白粳，有时竟远销到北京。小部分供应当地干部和部队。犯人一年中只有少数节日如中秋、国庆、新年和春节每人每天可配给到一斤大米，平时吃的仍是粗粮。那是场部用少量大米向附近老乡换来的小米、玉米之类的粗粮，作为犯人的主食。犯人对此毫无怨言，经历了多年的艰苦生活，长期挨饿，现在能吃饱已属万幸。由于水稻连年丰收，当局对犯人的粗粮供应放宽了尺度，犯人也心满意足，不复存在想吃好的奢望。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批劳改犯原判都在十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没有编入劳改队。一些在1950年前后判刑十年的犯人陆续服刑期满，到了释放的日子。哪知这当口又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那就是刑满的犯人必须填写“自愿留场就业申请书”，然后才能“释放”。

所谓“释放”，是从劳改队的大围墙内搬出到围墙外不远的土坯房去住，改称为农工队，仍然从事原来所干的生产劳动。与劳改犯所不同的是不称为犯人或罪犯，改名称为就业农工，或简称农工，意即农业工人，可不受武装人员看管，在小范围内有行动自由。每

月每人发给十多元人民币生活费，伙食衣着自理，每日三餐在农工食堂吃饭。饭食比犯人略好，但也是粗粮。其后生活费由于物价上涨，逐渐调整到二十多元。其它如劳动、作息时间、生活纪律、学习制度等与劳改犯毫无区别，而且还扣着“四类份子”的帽子，仍由原来中队的干部领导和管教。名义上有探亲假，实际上等于零。因为按规定，“新生”后不满五年、社会上没直系亲属、平时表现不好、靠拢政府不够等项中只要沾上一项便休想准假。而且其中后两项没有确定的标准，伸缩性很大，全由干部掌握，从而够条件请假而被批准的人数极少，只占全队人数百分之几。按此推算即便符合条件，上述各项都不沾边。如按人数排队，二十年也轮不上。

自从刑满犯人必须留场就业的规定公布以后，一些有老婆孩子的犯人在刑满后不肯填“自愿留场就业申请书”，向队部哀求要回家和家人团聚，结果非但无效还受到严厉批评。有一天大队干部来到中队作报告，大意是：“凡刑满的人必须填具‘自愿留场就业申请书’，继续留场从事农业生产。你们都是有前科的人，是人民的敌人、社会的渣滓，社会上容不得你们这批四类分子，即使让你们回到社会上去也是没有出路的。你们中间有人一心想回去，到期后不肯填留场申请书，以此来要挟政府。政府有强大的军警和司法机构难道会被你们这几个人吓倒？难道泥鳅能掀得起大浪？政府一再对你们说，你们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可你们仍坚持要回去，你们想要干什么？想要干老本行，继续犯罪？这说明你们在思想改造上没有收获，没有改造好。劳改当局要为社会负责，要为你们负责，决不能轻易放你们回去，纵容你们去作恶，危害社会治安，危害人民，危害国家。我们有责任强制你们继续改造。现在正式向大家宣布，凡刑满的人必须填具‘自愿留场就业申请书’继续留场就业，否则一律不释放，继续改造。在这期间，你们要作思想斗争，放弃幻想。什么时候思想搞通了，填了申请书自愿留场，什么时候就释放。”

会后有人发牢骚说：“以前是有期，这下变为无期了。”

又有人说：“既然是强制留场，何必要用自愿留场做幌子。”

此后不久，那几个坚持不填申请书的人陆续被迫投降。他们经过考虑，深知自己的力

量远远敌不过政府。尤其是在专政之下如果继续顽抗，不但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达到目的，还必然会导致更坏的后果，只有就范。这就是干部们所谓“思想搞通了”。

刑满“释放”后必须继续留场就业的规定，对我没有影响，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重回社会重见亲友的打算。我自投入劳改以后，父母相继在贫病交迫中去世，本人又无妻室儿女，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虽有兄嫂侄女一家三口住在上海，但他们生活窘迫，自顾不暇。哥哥又得了精神分裂症，侄女仍在上小学，嫂子帮佣贴补家用，这样一个家庭哪有能力来收容我这样一个身无分文又无职业的四类份子。我的出路也只有留场就业，别无它想，因此思想倒比较安定。不过对政府明明是强迫刑满人员留场，却硬要做出刑满人员自愿留场的假象，深感不满。这种无耻的欺骗行径竟出自政府政策，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我是在1951年1月底被捕的，判徒刑12年。到1963年元旦过后，离我刑满的日子一天天近起来，有了盼头日子好似过得很慢，而且还有些担心，到了期是否会发生周折，不按期“释放”？以前曾有过好几次这样的事，到期不放有的是由于原判法院没有来通知；有的是在刑期或日期上发生疑问；有的是由于加刑而没有记入档案。

我好不容易盼到1963年1月底。按惯例到了期的犯人当天一清早便会接到队部的通知，当天就不出工，收拾行李去场部领“释放证”和填写“自愿留场就业申请书”。可是那天一清早没有来通知我，我仍旧随小组出工，心中万分懊丧，闷闷不乐。在工地上也不能安心，心想我怎么尽碰上这样倒霉的事，这次又不知发生了什么周折。挨到中午收工，回到中队，队部立即通知我去，我心中一喜。

到了队部指导员对我说：“今天你刑满释放了。早晨我叫通讯员去通知你，他去得晚了一些，你已经出工了，工地离得远，通讯员又有事走不开，只好等到中午你收工回来后再通知你了。饭后你就去场部领‘释放证’，再去场部指定的中队去报到。”

早晨没有来通知我原来如此。我对此毫不介意，只晚了半天算不了什么，有人曾耽误过几个月之久。我思想上既放下了包袱，感到轻松愉快。指导员当时就叫我填写“自愿留场就业申请书”，我二话没说，拿起笔来就填。那“申请书”内容很简单，不消几分钟就

填好了，可是我很清楚，这意味着我从此又要继续过不知多久的苦难生活，忍受不知多少的精神折磨。

当天我从队部出来回到小组，吃完午饭，收拾行李，打起一个背包，装起一袋杂物，拿了队部发给的介绍信到三公里外的“乌兰农场”场部去领了“释放证”，又赶到指定的一个中队去报到。那是一个新成立的农工中队，只有农工，没有犯人。这与从大围墙内搬到大围墙外的农工队有所不同。这里没有大围墙，没有电网岗亭，没有武装人员看守。看不到这一切心中无比舒畅。虽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却有已进入自由天地的感觉。而且在那里遇见了几个小组中先我出来的人，好似他乡遇故知，相叙极欢。从此我结束了法律意义上的劳改，进入社会上所谓“二劳改”的农工阶段，在我的经历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慕太冲

本期校对：韦 陀